

視野



视 野

玉环文史资料

(第七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六月

統一祖國
振興中華

商景才題



理 財

林資史文和正

(揮筆)

附會員資林資史文和正

一九六二年一月

前言

——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

3月9日~10日会议公报——

基于这一指示精神，我们特约了五位乡友写了国外访问见闻，并汇编成专辑，定名《视野》

这五篇文章（以出国先后为序）是：叶文玲的《愿太阳照耀你》；叶本法的《赴美考察访问纪要》；叶尚青的《汉城见闻》；董楚平的《访日杂忆》；尤俊意的《明日黄花话访苏》他们以身临其境，亲耳目睹的事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态度实事求是，文章有褒有贬，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不仅内容丰富翔实，而且文笔流畅，内容生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炉。叶文玲的文章，以散文抒情见长，文章如诗似画，读来予人以美的享受，能奋人精神；叶本法是纯学术角度去考察，它吸取了不少先进医学科学技术经验；叶尚青写了一个与我国尚未建交而又陌生的南韩风情，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丑恶现象；董楚平是应邀赴日讲学的，主要介绍我国古文化的渊源和流传，也把我县出土的文物介绍给日本学者，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尤俊意是在“8·19”事件前一月去苏联的，

故有“明日黄花”之感。他在苏联时间不长，但访问深入，笔触所及，涉猎到各个方面，对解体前的苏联，在某些层面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文章虽长，读来入味，並不感赘。

我们出版这期《专辑》，目的在于通过介绍一些国外见闻，开阅读者的眼界，学习外国一些好的进步的东西为我所用，但由于汇编这样内容的专辑，尚属首次，其中不足或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识者不吝批评指正，並盼我县其他出国人员，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稿件。但愿这个《专辑》在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有所裨益，有所贡献。

编者

1992年6月

目 录

愿太阳神照耀你.....	叶文玲 (1)
赴美考察访问纪要.....	叶本法 (16)
汉城见闻.....	叶尚青 (22)
访日杂忆.....	董楚平 (31)
明日黄花话访苏	
——访苏追忆.....	尤俊意 (40)

愿太阳神照耀您

叶文玲



夏日刚过，秋天来临，当辉煌的阳光在我桌上跳着耀眼的光束时，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三月前遨游过的联邦德国，也想起了同行友人的一句极精采的话：

“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太阳！”

一点不错，在波恩，我们曾听到德国友人不止一次抱怨：

“这几天太不巧了，老下雨！”

在汉堡，我们又听得对方这样欢呼：“太巧了，你们一来天就晴，真是感谢上帝！”

慕尼黑的英国公园，据说是以大片草坪进行裸浴的好所在，只要天一放晴，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少就乐此不疲。可惜，我们去时正碰上阴天，小雨连绵不止，自然也就没有得见这个有趣而壮观的景象。但我依然记得，有一天路过一个叫勃兰肯姆的小镇吃冰激淋时，只见许多顾客不肯坐在室内而宁愿坐在屋外，为的是充分享受那一缕暖洋洋的阳光。

喜爱太阳的民族是健康有活力的，那么，在这篇小文的开头，我想首先送上我的祝福：

愿太阳神照耀您，联邦德国！

锦绣江山凭剪裁

这几年，就象中国的各大城市到处可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样，莱茵河畔也遍布中国人的足迹。不论公出或私访，不论留居或匆匆来去，大家无不交口称赞：联邦德国是极美丽的国土！

她的确美丽；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一降落，我就感受到了她的美丽：高朗的蓝天下，铺天盖地的绿被簇拥在风景如画的大地。

在25天的出游中，我们日日奔波，从这一地到那一地，从城市到乡村，极目四野，无处不见郁郁苍苍的森林，无处没有绿茵如毡的草地，哥特式楼房尖耸在各式各样的房子中，五颜六色，非常别致。

由于建筑的精美，由于良好的保养，绝大多数房子都象刚建好似的十分新颖，所有的窗口都悬着雪白的窗纱，或半垂，或斜系，流苏款款；窗子里外都是花草的世界，或鲜花，或吊兰，非常悦目，在常春藤和鲜花交织的房墙上，光这些窗口就是一幅幅优美的图画。

联邦德国的人民，天性整洁爱美，不管房屋大小，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讲究卫生，布置美观，我们曾在各种旅馆和普通人家住过，普通人家也和旅馆一样敞亮整洁、纤尘不染，不用说，在一个整洁美观的环境中居住生活，是何等舒适。

就环境来说，他们的城市和乡村简直没有区别，城市美丽得象花园，而乡村更是如诗如画的田园，而从居住的宽敞和空气的清新而言，乡村更胜城市一筹。怪不得他们的有钱人往往

在乡村买小别墅，乡下没有房子的，星期六星期天也总要开车带着活动小屋到乡村去度周末，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在联邦德国，我曾不止一次感到惊异，如果说造物主赋予人们同样的大自然，但这片大自然在他们手里，被建设得那样精妙，虽然我们只是浏览了她的大致，但就我所见，没有一寸土地有令人惋叹的荒凉凋敝，没有一处令人不快的裸露和零乱，就象一块被精心裁剪又精心绣制的江山，她千里沃野尽妖娆，处处花团锦簇。

在联邦德国，我也曾不止一次将她与我的故乡浙江比较：她的面积和人口恰恰都是浙江的两倍。虽然两处地理位置大不相同，气候的温和湿润又十分相似，同样的山青水秀，同样的物华人丰，但从建设上看，浙江是一块刚刚开雕的璞玉，而联邦德国早已琢磨成器。

浙江最美数杭州，杭州最美属西湖，因此，人若问我联邦德国如何，我便常有一说：联邦德国就象杭州西湖。

“黑绸带”之歌

象在黑绸带上滑行，象在鲜花丛里飘忽，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象一位美妙的天使，给每一位旅游者，都插上了神奇的羽翼。

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太棒了！那一条条笔直笔直的路，象银亮的蛛网、黑色的血管，密布联邦德国全境，无怪发言人要公布这个在世界也值得骄傲的数字：全国公路总长达475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长达7500公里。真正是如蛛网交织，随处都可以以车代步啊！

说它是黑色的血管也不假，众所周知，联邦德国最有先进的空中交通，还有非常便利的铁路交通和海上交通，尽管如此，公路仍然是不可被取代的交通要道。联邦德国经济的起飞，公路和高速公路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你看，每日里，那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道路，流车如龙，无论是载重大卡车，大小面包车，还是小轿车，都各各有道，真是畅通如血管啊！

当我们行进在通往波恩、汉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处的路上，看着那因时速而异的六股、八股道高速公路，如绵绵无尽的黑绸带飘向远方时，我真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图画！

我本来有点晕车，又怕闻汽油味，但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乘车奔驰，却相当惬意。光滑平整的路面，良好的交通秩序，稳定的时速和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使你人在车内不但不会感觉不适，更有飘飘欲飞的感觉。

“这汽车轮子只要稍一离地，真能飞起来！”同行人中，不止一位发出了这种感叹。

一点不假，在联邦德国旅行，我真正体会了“飞驰”一词的意味。25天的流连，我们东西南北浏览了大大小小20来个城市，常常在一天之内纵横来去好几处相距几百公里的地点，若不是这样好的道路和极好的汽车，哪能这般称心如意？

真的，在联邦德国旅游，你绝不会有倦怠的感觉；因为，当你在一条条“黑绸带”上身轻如燕地飞驰时，或者蓝天朗朗，或者细雨飘飘，而四周和前方永远是这样明丽，车窗两旁飞闪过的更是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要么是绿树丛中高耸着一座座七彩玲珑的尖顶楼，要么是一大片麦田中镶嵌着一方方金丝绒黄的油菜地……清风阵阵、芳草飘香、高低盘回、目际甚宽，在这样的境地中旅行，你只觉得将会驰往美的极

地，于是，你心情越发舒畅，喉咙痒痒光想唱歌。

呵，难怪，难怪我们一行人，一路奔驰一路歌，在莱茵河畔的这片国土上，撒下那么多的歌声和笑声。

语如细弦声切切

忘了是哪本小书的作者这样评说外国人：美国人热情、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古板、德国人冷峻。

于是，我就有了这种印象：严肃冷峻是日耳曼民族的共性；于是在我脑海中德国人便是这样的形象：五官棱角分明，身材瘦削笔挺，目光冷锐，不苟言笑。

事实并非如此。

在法兰克福，在波恩、汉堡，在西柏林、斯图加特，在慕尼黑，我们见到了多少德国人啊！

无论是在安静如睡的波恩公园，还是在西柏林的明媚阳光下，到处可以看见德国人热情洋溢的笑脸，而且并非都是瘦高条；不管是在歌剧院还是摇滚乐演出场，无处不能发现德国人拼命享受生活的欢乐而且还非常浪漫；于是，我渐渐发现了德国人的另一种形象：他们并不冷峻古板，相反，他们热烈得很，活泼得很，健谈得很，有最准确的生活节奏，也有很放纵自己的时刻。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有共同的品性——不管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工人，文明的教养人皆具备；且不说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恶习绝对没有，越是在公共场所，越能体现他们的教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话的声调，总是那样轻轻的、低低的，真是语如细弦声切切。无论是飞机场、火车站、电车上，

还是市场中、商店里，都没有人高声喧哗，即便是最容易引动感情的或人数众多或两人对饮的饭店酒馆，也总是私语喁喁，声音放得最小最低，绝不影响他人。

许多次，我们在饭店吃饭或在高速公路旁快餐馆用餐时，总觉得静悄悄的，推门进去，才见里边顾客并不少，满当当的座无虚席，但就是不闻噪音。店主和侍者笑脸相迎，殷勤的询问有如亲切的耳语，顾客按需点菜，文明用餐，绝对没有大呼小叫或杯盘狼藉的现象。难怪我们留连的这许多天中，在所有去过的公共场合，连些些龃龉都未曾见过，更不要说有争吵相骂的情形。

我想起了一个又一个接待我们的德国朋友，他们在与我们相处交谈时，十分活跃乃至滔滔不绝，可是，即令在会上发言，他们也总是温文尔雅，软语款款。即便要开怀大笑，也不是肆无忌惮发高声，而多以飞扬的神采，眉跳眼动的表情，传递心中的愉悦。

至于饭馆商店的服务态度，那更是没话说的，彬彬有礼，亲切待客是他们毋庸置疑的信条。我记得我们的副团长从维熙先生曾花大价钱买了个照相机镜头盖，当时并非迫切需要，价格与国内相比，也绝对划不来，但还是买了。为什么？从先生说得好：就为了售货员那百拿不厌的耐心，就为了对方那亲切动人的微笑……

文明的举止，软款的谈吐，看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却充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和文化教养。回国后好一阵，我曾对周围高分贝的噪音，人们说话时的高腔尖嗓门分外敏感，不用说，对粗暴的服务态度和种种不应该有的争吵更加惊恼不已。反过来一想，竟十分讶然：我是不是吃了几天洋面

包，就瞧不起自己人了？

当然不是如此。但我多么盼望我们的同胞都具有良好的教养，无人不是“语如细弦声切切”啊！

迥然有异的风采

联邦德国丰富多采的文化早使我们仰慕，主人为我们安排了各种游览和参观项目，但最使大家为之兴奋的是在西柏林观看的两项内容，风格乃至观众情绪都迥然有异的歌剧。

头场是在国立歌剧院。

那一天由于晚饭拖了时间，我们来到堂皇的剧院大厅时，几乎是最后一分钟，气喘吁吁赶进场内，却差点找不到位置，开演前的剧场一片漆黑，容纳上千人的上下两层大厅，鸦雀无声。

据说这个剧院有着最严格的规定：迟到一分钟就不许进场，观剧时绝对不许出声；另外，观众必须衣履整洁，男士西装革履自不必说，女士则要穿晚礼服。

猛一听，似乎有点过于苛刻，细想想也无可指责：观赏高尚的艺术，理该拒绝粗俗的行为，遵守纪律。

有趣的是，为我们张罗这一切的德国朋友，虽然买了票却不知今晚演的是什么，四处寂寂又不许动问，于是，好戏只能等开场才明白。

谢天谢地！幕一拉开，熟悉的布景，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歌曲，我一下听出了是《波希米亚人》，男主角和饰演“咪咪”的女演员一开唱，便十分动情。

演员的表演十分成功，几乎每唱一段，台下都响起一阵热

烈的掌声，渐渐地，我发现这种鼓掌与其说是知音者的由衷欣赏，不如说是观众对演员必有的一种礼貌，于是，我不由得同时注意起观众来了。

黑压压的大厅那么肃静，整场演出，从头到尾静得连一丝咳嗽和呼吸的声音都没有，真让人怀疑院里是否还有观众，所有的观众又都坐得那么板直、那么僵硬，自始至终纹丝不动，一个个仿佛成了“铸”在那里的蜡人——你不能不佩服这种自觉的文明习惯和铁一样的剧院纪律。

休息时才是所有的绅士特别是盛妆的太太争奇斗妍的机会，大厅里熙熙攘攘，一派“古典”景象：西装革履的男士们极有风度地挽着女士的臂膀，鹅视鸭步地踱着，女士们则无一不是珠光宝气，浓妆艳抹，不管芳龄几许，一律做出风摆杨柳的姿态，扭扭捏捏地穿梭来去……不知为什么，他们的衣着和神态，总令我想起欧洲几位大作家笔下的宫廷集会或有钱寡妇沙龙中的贵族男女，虽然头上华灯璀璨，我却恍然疑是身处前一个世纪。

就在这时我才发现：来听这些传统名歌剧的，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

第二天晚上的情景，就完全不同了。

这场歌唱晚会，在市郊公园的一个帐篷中举行，歌唱家是来自阿根廷的苏姗。

这样的地点，当然是“民间”组织的。我们断断没有料到的是这场演出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在公园的售票处前，人们排起了长队，发售的却是三天后的票，由于不对号入座，人们急不可耐地在门口挤成了团团，为的是一开门便可以呼啸而入，抢占到最好的位置。

不用说，今天的观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自由自在，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入口处出售印着苏姗头像的唱片，一见她的容貌体态，我便惊异了：一个年过半百既不窈窕又不美丽的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进了场后，才发觉舞台和场子也很简陋，观众席统统是硬条板凳，舞台几乎毫无装饰，只有一名鼓手，一名吉他手为歌唱家伴奏。唱一开场，激越的鼓点和悠扬的吉他便奏出了欢乐的旋律。

苏姗，阿根廷的歌唱家，终于从台子的左侧，姗姗上场了，观众席上，立刻掌声如雷。

我凝神看苏姗，只见她和唱片封套的照片完全一样：体态高大丰满，印第安人似的方正脸盘，肤色却很细白。她着一双黑色马靴，穿一身紫黑条纹相间的裙袍，披一条同色大披肩，一头乌亮的黑发，一如我们的乡间妇女一样随便抿着，普通极了，也平凡极了。

“苏姗！苏姗！”观众欢呼，掌声越发热烈。每个人都拼命呼喊，似乎要教她听见自己对她的呼唤。

苏姗微微笑了，啊，她的牙齿贝壳似的洁白！

苏姗用西班牙语报出了今晚要演唱的歌曲，于是人们又一阵欢呼，听说她的腿有微疾，因此在报完后，她立即在小桌前坐下唱起来了。

苏姗安宁地翻着乐谱，翻一首，唱一首，既无张狂的表情，更无做作的手势，可是，极懂心曲的观众，越来越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的爱慕和痴狂。

唱了七八首歌后，苏姗离座，抽出一条白绸帕，一边挥动

一边唱，观众更受感染，鼓掌作拍子，台上台下交融一片。

下半场演出开始，观众的情绪更加热烈。

复出的苏珊脱了大袍和披肩，一直不停地走着唱，我们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真正的音乐无须翻译，我们只感受了真诚热烈的苏珊，用自己的心在呼唤着南美洲的大地。

“下面，我要为智利唱一支歌！”苏珊忽然用德语宣布，这一下，观众更加欢声雷动，尖利而快乐的口哨，象警笛响彻空间。

苏珊挥着绸帕，踏着小巧的马步，从舞台这头“踏”到那头，就象智利的农妇在快乐嬉戏，她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纯朴，大家无不为之动容，欢呼声又山呼海啸起来……疯狂的掌声使苏珊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谢幕。

最后，苏珊完全沉入了和观众的感情交融之中，她应观众的要求，一再唱着迷人的民歌，一再摇着迷人的手，一遍遍地热情呼唤：“……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尼加拉瓜！智利！巴西！阿根廷！”

观众们再也按捺不住激情，一个个泪流满面，一声声地呼喊：苏珊！苏珊！……群情沸腾如达顶点。

苏珊唱的是女中音，那浑厚有力、永不疲倦的声音的确有无上的魅力；苏珊还有最动人的微笑，这微笑既有女性的温存，更有母性的慈爱；苏珊还有一双漂亮的纤巧的手，连连挥动时，那双手真是充满了温柔和诗意。

我们听说苏珊现在四处流亡，是因为受了政府当局的迫害，但她的观众不仅遍布南美洲，而且已经扩大到欧洲，所以每到一地，便连演不衰，许多观众是从外国跑来的。啊，苏珊并不贫穷，到处都有知音，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她拥有

东西两半球！

今后若提阿根廷，肯定忘不了苏珊！

要说德国人的激情和喜欢音乐的天性，我们后来在纽恩堡的汽车竞技场，看美国摇滚乐队来此演出的盛况更有体会：那个可容几十万人的大场子，音乐震耳欲聋，人们情怀激荡，演员如痴如醉，观众如颠如狂。偌大的场子，简直象开了锅，塌了天……现在即便是回想这一切，我都禁不住要头昏手颤、心率骤增；这不是夸大其词，那实在是一个无法形容的疯狂已极的大场面。

想想头天看演出的严肃拘谨，看看今日的热烈疯狂，我无法判断：到底哪一种更能代表德意志文化的风采？

味道悬殊的吃喝

写下这个题目似很粗俗，但人生需要，除了住和行，当然还要吃、喝。

这里，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喜欢喝啤酒，请到联邦德国来；如果你也不喜欢西餐，那么，我将悄悄补充一句：他们的饭菜可真不好吃。

联邦德国无愧是个酒乡。不知是阿尔卑斯的雪水特别有味，还是巴伐利亚州的大麦特别芳香，联邦德国的啤酒就是好喝。

啤酒，成了德国人最能佐餐的饮料，午晚两餐，几乎都见啤酒上桌，每到一地，也总有啤酒招待。我见德国人喝啤酒，从来无需配菜，端起就喝，而且，男女老少，无不喜爱。

慕尼黑的啤酒最为出名。我们在慕尼黑品尝过各种各样的

啤酒，还知道了这儿既有普通啤酒，又有白啤酒和黑啤酒，不会喝酒的我，虽然不能内行地品评各有各的滋味，但出于礼貌和应酬，也少不得沾沾唇，于是，不管是白啤黑啤，一律觉得它们都是那样清醇芬芳，味道好极了！

在巴伐利亚州考黑尔湖畔一个山中小酒店，我们又一次尝了品酒的异趣。

一进店坐下，店主就端上各式各样的酒杯，有的描金绘彩，有的形如一只大靴，而且每只酒杯都大得出奇，至少能装两公升酒。要“端”起这样的酒杯，自然不轻巧，要么用两只手捧，要么用臂肘拐着了“背”，这样有趣的酒杯，加上店主那酒桶般的身躯，更使大家笑哈哈，乐陶陶，连几位不喝酒的同行都捧起了杯。

一天傍晚，也是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镇，我们又无意得遇了一个由猎人团体组织的狂欢活动——啤酒节，自此更见识了德国老百姓那无拘无束的天性和惊人的酒量。

我们去时，这个历时十天的“啤酒节”正趋尾声，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房子里，还有一个舞台。台上由乐队演奏着一支支助兴的乐曲，台下是一群又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男女老少，而他们的面前，还都各自摆着那种盛着至少两公升酒的大杯。他们有的是全家聚集，有的则远道而来，大家围桌而坐，边听音乐边唱歌，尽醉尽欢。

向导告诉我们：由于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而且欢乐也刚刚开始，这批豪饮者要到什么时候散去则很难说。我们看着这一群群脸似熟螃蟹、两眼水汪汪的酒仙，真觉分外有趣。主人介绍了中国作家的来访，酒仙们一阵欢呼……被这所罕见场景鼓舞的安王忆，应邀上台指挥乐队奏了一支曲子，于是，场上

的气氛又进入高潮。

快活人最易得快活，联邦德国无愧是个醉仙之乡！

相比而言，他们的饭菜则叫我实在不敢恭维了。

也许是我那顽固的口味，总是难以接受西餐，于是常常以一份肉排、一份炸土豆、一盘生菜色拉代饭的吃法实在令我倒胃口，在那里，喷香烫口的面条、稀饭、咸菜小吃，是休想有人会做的，即使端上一点米饭，也是凉的或拌得油糊糊的，好好的鱼要粘上面粉白煎再浇奶油柠檬汁，弄得难吃透顶，好好的肉除了做成烤肉排，好象就没有另外方法；你想吃本乡本土的中餐吗？只有找中国人开的饭馆。

怪不得每每到中国饭店吃一顿，就令我们喜笑颜开，怪不得华人朋友黄凤祝先生那所傍着莱茵河的“香江”饭店，成了大家最喜欢的落脚的所在。当然，出于同胞情谊，黄先生对我们竭诚款待，地道的中国饭菜，十足的家乡风味，有一阵大大弥补了我们一日三西餐的遗憾。

当然，德国的饭菜也不是绝对不好吃，也并非千篇一律，比如说，慕尼黑的“白香肠”颇享盛名，于是，这道颇享盛名的饭菜（我用了饭菜二字，是因为实在说不清它算是饭还是菜），就不止一次地来到我们的餐盘。对于它，大家也是褒贬不一的，有的说是新鲜、汪嫩，十分可口；有说是就象寡淡得用豆腐脑做的，却比豆腐脑腻歪；对于它，我的态度是尝一次尚可，第二次再吃，便再也不唱赞美诗了。

当然我们也不止一次被主人安排去尝新鲜。比如说，在西柏林，我们曾进过一家“土耳其饭店”，那饭店的装饰极有风味，那饭菜却教人满怀希望而又大失所望——一道主菜居然是半只嵌了肉糜的茄子！

有趣的是，这道菜还有个极吓人的名字：“一个人倒下了！”

马马虎虎地吃了这顿饭出来，大家诙谐地互相打趣：我也快要倒下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这样大肆批评实在有失礼貌，如果忘了阿尔卑斯山脚的那家叫“欧巴·阿莫高尔”的“玫瑰酒家”，倒真有失公允了。

那天从奥地利边境畅游归来，我们一行六人由汉纳·米希尔斯先生领着到此处用餐。这间座落在边境乡村的小饭馆，环境十分清幽，房子异常漂亮，房墙上画满美丽的图案，各种色泽的郁金香围绕在房子四周……更诱人的是，女主人服务得十分殷勤周到，饭菜又特别鲜香可口，小牛肉、鹿肉、煎鱼各得其味，主人还端出了店中最出名的大菜：玫瑰拼盘……津津有味地用完以后，记得张承志曾满意地感叹：

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酒家这顿饭！

来吧，朋友

写完这篇小文时忽然得闻：联邦德国的友人即将来中国旅游。

我欣喜异常，首先想到了当初盛情邀请我们的主人——赫尔玛·赛德尔夫人，还有汉学家顾彬和黄凤祝，德国朋友汉纳·米希尔斯，以及曾经热情接待过我的莫妮克夫妇、查利夫妇和古妮母子；此外，还有波恩大学、汉堡大学的几位年轻的汉学家：罗溪薇、倍梯娜、顾尼娜和柯林娜……啊，你们好！你们这么快地应邀前来，真应了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句话：

波恩——北京，并不遥远！

但我又听说，这次来的，并不是我们所结识的全体；而到杭州的，也只是几位代表。即便如此，我也无限欢欣，一颗快乐的心，已跃动如钱塘江的秋潮。

因为他们的到来，我又顿时想起许许多多的事还没有写进这篇小文。比如说，我们所采访的敬老院、农场、劳工局和救济局；我们所浏览参观的大学、大商场、大赌场和各地名胜古迹：教堂、古堡、名人故居以及博物馆……

在那些日子里，令人快意的节目真是多不胜数，我忘不了庆贺赛夫人七十岁生日的泛舟莱茵河，也忘不了奔波几百里到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三国交界处的畅游；忘不了在波恩市郊农场看六岁儿童表演骑术，更忘不了在边界小镇与德国青年一起跳舞……当然，最难忘怀的还是波恩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周”，在那里，我们结识了那么多新朋友，有那么多双眼睛渴望理解和交流！……

幸亏我不疏懒，归来之后，我整理了五万余字的日记《莱茵河畔25天》并将发表，因此，每每忆及种种情景，我总觉得友谊的暖流一如秋天的金雨，洒满心头。

来吧，朋友！西子湖的风光一点不亚于莱茵河，杭州有最明媚的太阳！

稿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

作者介绍：叶文玲，女，本县楚门镇人，知名女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赴美考察访问纪要

叶本法

1987年7月20日至10月10日间,应美国康乃尔大学克拉克教授的邀请,考察和访问了康乃尔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州东北部地区、华盛顿的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军事医学博物馆和美国西部的阿利桑那大学及其癌症研究中心。

20日中午12时,上海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我们从虹桥机场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图——848飞机,先到日本东京。机内500多座位上,大多是美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东京国际机场,机上播音员通知各旅客在东京机场要办理转机手续,在下午6时准时飞往纽约。由于我初次出访,人地生疏,又不懂风俗,未去东京游览,就地在候机大厦漫游和观察:该机场的建筑,像梅花型,每个花瓣楼有近十个停机坪。从中央的机场大厦高层楼中向四周瞭望,该机场的范围,可能有楚门镇这样大小,每分钟有一架国际航班的飞机起飞或降落,每天送往迎来的旅客之多,货物之茂,可想而知了。可是,由于建筑设计和管理技术精巧,层层各机坪口有候客厅、办理手续台、电话、电视,每幢梅花型建筑中,有问讯、电报、卫生、购物、路标、航班电动目录以及连接中心区的自动传送带设备。整个机场不显得拥挤、忙乱,反而觉得井然有序。

20日下午6时,班机从东京出发,横跨太平洋,向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前进。服务人员为了减轻旅客因时差出现的不适应,在日落之前,先将所有的机窗用厚帘遮起来,同时送上丰盛的晚餐。然后控制灯火,银幕上仍不断放映节目,声音是柔和的,使你似睡非睡,听其自然休息。21日入美国境后,飞机开始低飞。飞到纽约,已近黄昏。下得国际机场,办好入境手续,幸好有儿子和儿媳在机场内的“外宾”出口处等待着。出了大门,直接坐上小轿车送我们到(美)国内机场,再坐联票定班的飞机,去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的机场下来,由迎接我们的克拉克教授陪同,坐车直达这次访问的第一站——康乃尔大学。

康乃尔大学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名牌大学,座落在纽约市北面约5—6个小时车程的低山头上,相对的西边,也是一带逶迤百里的风景山区。两山峡谷间有一条狭长平地,居住着5—6万居民,形成一个主要为该校师生服务的商业网点。与平地相连接,还有一个长湖,组成美丽的风景区和避暑胜地。我们这次应邀赴美的主要目的与任务,是代表中国、江苏及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接受美国国立癌症中心200多万美元的课题经费,来研究中国江苏启东肝癌高发区高危人群筛检模式、硝酸盐干预试验及其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设计计划,拟制一系列的表格和手册。如调查表、筛检表、给药登记表,实验检测表、质量控制表、统计分析表以及相应的各种手册;进而研究具体的预防措施和预测方案,并计划参观考察若干有关单位。我们在该校逗留了一个半月时间,还抽空游览了美国东北部近加拿大的地区。

纽约是个很大和很热闹的都市,它的最繁华市区,建在纽约海湾内的一个长方形岛上,以桥和地下隧道与陆地相连接。

那儿摩天大厦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好不繁华。纽约大学正座落在纽约市中心区，距离它不远处，有享有盛名的联合国本部大厦和藏书最多并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纽约（市）图书馆大厦。由于我的儿子与儿媳均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因此，我也顺便参观了上述三个单位。

从纽约州东北部到华盛顿，车程整整一天。克拉克教授热情地请我们三人坐上他的新轿车，亲自驾驶，从早晨出发，让我们由北向南观赏了美国东部的风光。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穿过田野、村庄和大小城镇，首先感觉到车子很多，可是秩序井然，好像有人在指挥似的。问其故？答曰：一是每位开车者要遵守交通规则，否则惩罚从严；二是车速快，一旦违章，非常危险；三是各路口关隘上有电动检测器，指示灯和路标，若有违犯，记录在案，违章必罚。在农村和小市镇，每幢房子结构大多不同。高速公路和一般车道两边都有树林、草被、庄稼或建筑物。有时在路旁还能见到小鹿、兔子和松鼠在跳跃。到了华盛顿，其中白宫、林肯纪念堂和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组成的三角区，有似我国天安门广场及其建筑群。在华盛顿，我们参观和访问了美国国立癌症中心，并与对口部门讨论了科研计划，实施方案以及学术交流。他（她）们对我国癌症现场和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也是他们乐于出资几百万美元与我们协作，共同来攻克肝癌的原由，也是他们想做而在国内没有条件做起来，而我们有良好的现场科研基地，创造了这类课题研究的有利条件。

在华盛顿和纽约逗留了两周之后，我们从美国东海岸纽约坐飞机直飞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南面阿利桑那州的阿利桑那大学和癌症中心。这条由东向西横跨整个美国的航线，大约相当

于我国上海到新疆乌鲁木齐的距离。阿利桑那大学座落在阿利桑那州的杜桑市。市区人口约30余万，可横跨东西长百里的地带，入夜灯光灿烂，像条银蛇在飞舞，非常好看。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这里是沙漠中的“绿洲”呵！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多星期，参观访问了该大学中有关院系和癌症中心，也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继续拟制课题计划中的表格和手册。

10月8日返回纽约，10日中午12时，由儿子、媳妇送我们到机场，旋即上机起飞，跟着太阳跑，到东京是当天午后一时（实际上已过了13小时了）我们办好换机手续，随旅游车入东京浏览一番。下午6时，追赶落日，飞过日本海，越过釜山上空，直达上海。这时正好是中秋佳节，一轮明月挂在神州上空，照耀着祖国人民，同享中秋团圆之乐，我们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回到祖国和家乡来了。

这次考察访问，给我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所到之处的各单位、图书馆书刊藏量多，设备完善，层次分明、教研结合、使用方便、电脑化处处呈现。例如州、市有庞大的州、市立图书馆（大楼）、大学有大学图书馆（大楼）、每个学院、部系或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的图书馆，甚至各室也有它们的专业书刊和工具书室。如阿利桑那大学医学科癌症研究中心（相当于我国省级医学院肿瘤研究所和肿瘤医院）的图书馆，占高层大楼的整个二层楼和部分地下室。图书馆大门装有红外线 and 磁声设备，可自由出入，不怕失窃。在大厅，醒目的见到四个部份标识：

- 1、索引部，它可提供你所需的文献目录；
- 2、分类部，它可查阅你所要的参考书刊，若本馆没有，可以委托向国内外借阅或购其书刊和文摘；
- 3、阅览部，书室里书架林立，期刊室近期刊物开放阅览。并有电脑设备和复印机供其使用；
- 4、电脑

中心部，有大小电脑装置，有录音、录像、宏观、微观室以及磁带盘、盒室。我们看了一盒由电脑控制操作的肝脏录象片，它从肝脏的组织胚胎、解剖生理、病理、生化，一直讲到主要病种的肝脏病学。在各章节间有描述、有提问、答疑、多选题、讨论与小结，最后还有模拟考试，考考读者有几分收获。这是非常好的教研结合，发挥了图书的多功能作用。图书馆中的所有书刊、索引和录相，都可以代录和购买。难怪我们在讨论课题设计时，当指出生存率与病死率是两个不同概念与范畴时，克拉克教授随即引用了我国吴孟超教授的文献作证。

这次考察访问给我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不分国籍人种，择优录用；高精尖仪器设备，专管专用，按计划进行。参观了康乃尔大学和国立癌症中心的相关几个实验室。有日本人、南朝鲜人、印度人、南美洲人、欧洲人、美国人、当然也有我国大陆和台湾同胞。他（她）们工作紧张，见面时仅含笑点头或打个招呼：“嗨！”、“哈罗”、“早上好”。一次碰上一位朝鲜姑娘，我误认为是中国同胞，高兴的问她：是不是中国人，她微笑地说：不是，是高丽人，手上操作还是不断地进行着。从上午8.30直至下午5.30（中国有一小时午餐），他（她）们工作很认真，为检验工作，有时还将样品送往检测中心去复检、核对。因为这关系到声誉和待遇问题，也是道德、纪律的约束。但逢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时，他（她）们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尽情地玩、购物或游览。其中最活跃分子，当推大学生和研究生了。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具有高度科学技术和文化素养的青年一代的。

“从总体上说：美国是具有高度文明和富有的国家。但在社会深层：家庭、团体、伦理、道德、治安等等方面，并不先

进，问题不少。科学先进，也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不是我们盲目崇拜的理由，恰恰是鞭策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差距的动力。这是每个有良知有一颗赤诚爱国心的中国人，出国以后所产生的共同理念。科学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类的前途充满着希望。”

作者介绍：叶本法、男、本县鸡山乡人，现任南京医学院教授、江苏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顾问，淮安市人民政府肿瘤办公室顾问。



汉城见闻

叶尚青

朝鲜半岛与中国是隔江相望，山水相连的比邻，朝鲜人与我们都是同一肤色的人种。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和南朝鲜尚未正式建交。但是两国在民间方面的旅游和经商等等往来，近几年里较为频繁。今年年初，两国在北京和汉城互设商业贸易代表处，这才开始了国家级商业贸易。然而，我国文艺界尚未有人公派进入南朝鲜，而今，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因专业工作的需要，于今年五月间受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随我国国际贸易展览团来到汉城参加了中国国际商会展览会，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中国书画艺术而工作。

在南朝鲜的所见所闻，有的令人钦佩，也有的感到惊讶，甚至气愤。

(一)

首先，从商展说起吧！

我们商展的全称是：中国国际商会贸易展览会，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南朝鲜举办的商展。在汉城江南区的贸易展示中心，具有现代化的设施和规模，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水准。高大而宽敞的展览大厅，我们租用了三千平方米，只占去五分之一的场地，我们布置了航空、资讯、电脑、

旅游、文化、食品、医药、造船、服装及地方轻工业产品等等，其实，这可谓是规模庞大、品种繁多的博览会。我国有一百家的省市大型企业参展。就我们展览团的成员来说，有三百人之多。我们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来到汉城，是南朝鲜有史以来第二次接待如此之多的中国客人（第一次是奥运会的运动员）。好客的主人和我们的后勤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我们的吃、住、行等生活问题，这项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能善始善终的完成了任务，使我们皆大欢喜。

在开幕那天，令我们格外高兴的是来自汉城的商界人士、华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外国来宾，人山人海，密密匝匝地挤满了展览大厅。加之，我们隔壁有了东南亚国家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五国的联合商展正值开始，所以，我们展厅里的观众更是熙熙攘攘，贺喜的花篮五采缤纷，精致的展品琳琅满目，把展览会装扮得极其瑰丽、雄伟，整个展厅轻荡着一片欢乐的热流。在隆重而壮严的商展开幕仪式上，首先由中国国际总商会会长程鸿业同志致开幕词，接着由韩国贸易振兴公社董事长致贺词，嗣后，两国商会代表分持银剪，剪开了中韩小姐手执的红绸彩带，由此，两国之间国家级的经济交流活动宣告正式开始了（韩国的商展已于今年四月在北京举行）。

我们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观众，在整整一个星期的展览中，大约有六万多人次的观众川流不息的参观着。也因为南朝鲜的人民第一次看到中国如此之多的展品，都感到十分新鲜和稀罕，当他们拿到一份展览目录时，就把它视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倘若我们赠送一件如熊猫钥匙圈之类的小礼品，更是爱不释手。有的观众今天要了一份小礼品还不满足，明天

带着妻子和小孩又来排队领取礼品。这样的观众是为数不少的。

我们的商展确是很有吸引力，迎接着前来参观的各国朋友，他们看了展品后赞叹不已，有的特地从日本、澳大利亚，或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赶来选购展品的，更有的事先联系好了只不过在展览会上最后落实和签订合同的。如我们航空航天部门的人造卫星，成为展品中的热门货，因为它已成为世界科技之最了，所以，有许多南朝鲜的和其他外国朋友，他们都争相而来参观和签订合同。

(二)

再说说有关朝鲜半岛的来历和传说，这将有助于了解朝鲜国的历史变迁。

朝鲜被称为“高丽国”的由来，曾有这样的传说：西欧人都把朝鲜国称之为“KOREA”。（考里阿）。据考证，这种称呼来自一名朝鲜普通儿童的名字。

在一五九一年，日本的一个名将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次年五月攻陷故都汉城，后又侵入北部，在战争期间，朝鲜人被日军强迫押运到日本当奴隶的就有五万多人。后来日本国终于战败了，他们仅把其中的部分人归还于朝鲜，其余大部分儿童和妇女贩卖给澳门、菲律宾等东南亚一带国家和地区。一五九八年，意大利神父佛兰西斯考来到日本，他在回国时，带走了五名朝鲜儿童。归途中，在印度古阿，他把其中四名儿童保释为自由民，自己身边只带了一个由他起名的安托尼奥·考里阿（ANTONJOKOREA）的朝鲜儿童。于一六六〇年才回到意大利罗马。从那时起，在意大利人之间，就把“KOREA”

作为“高丽国”的代名词逐渐传播开来。此后，这种称呼渐渐传到西欧，并为西欧人和东方人所接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再者，据考证：高丽即是高句丽的另一称呼，始于公元六世纪初北魏正始中期，后在公元916年，王建创立了朝鲜王朝，国号高丽，都城开京（即今汉城）。公元936年，王建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以上所述两种考证，只是一些资料汇集罢了，但不是历史变迁的结论。

(三)

朝鲜半岛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和文化发达的古国，朝鲜民族是单一的朝鲜族。他们的智慧和才干，勤劳和刻苦，生息繁衍，世代相传。今天的汉城拥有一千五百三十万人口，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市内高楼林立，建筑新颖，立体马路，车水马龙，地下商场，繁华景象，堪称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尤其是在奥运会前后，发展更是迅速，那里有新建的奥运村、奥运公园、奥运旅社等等，各种建筑物的四周都有现代抽象派的雕塑作点缀。总之，一派现代化的建设，给人耳目一新。现在，那里正在竖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大都是用钢筋为梁柱所建造的，这样牢固而坚实的大厦，要多少钢材？要多少资本？还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水平？这些老板们的经济实力如何雄厚，是可想而知的。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将带来财政冒险，经济滞涨，但毕竟金钱是万能的，人人拥有数以万计的金钱，就有了一切。他们提出建立资本主义口号，目的是使国家的经济走向现代化和超级化，使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活

力。现在南朝鲜的人均收入为五千至六千美元，仅次于台湾，在经济上他们真不愧为“亚洲四小龙”之称。

汉城的一家最大的超级百货商场叫“LOTTE”，可以这么说，要比杭州百货大厦大七倍左右，那里的商品应有尽有，除了日用百货外，还有饮食店、菜市场、游泳池、溜冰场、电影院、音乐厅、停车场（有三层）等等。如果你要走遍所有柜台，恐怕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还不够哩！如此之大的百货商场，确实令人惊叹！另一座67层的大厦，是汉城最高的建筑，以住宿、饮食、百货和娱乐场所为主。大厦内外的构造和设备，都非常气派，被人们称为“超现代派”的建筑。在那里能品尝到东西式的珍馐美味，能住上舒适而豪华的套间，能观看惊险而动人的全景影视节目，等等。这两座超级的现代化建筑，都是为迎接奥运会而建造的。从此看来，南朝鲜的人民政府，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的新潮中，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济腾飞时期，他们奋力拼搏精神，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诚然，那里的物价很昂贵，贫富悬殊，一般的商品要比我们国内贵几倍甚至贵十倍。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免税商店中有的商品要比其它百货商店要贵得多，所以这些商店里很少有人光顾，显得冷冷清清。从此看出，在他们这样高工资高消费的社会里，人们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从汉城街头的表象看来，那里的人们为了按时上班，行动都很紧张，男士手提公文包，西装笔挺，衣冠楚楚，女士彬彬有礼，斯斯文文，上公共汽车都自觉排好队，这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了。但是使我感到最累赘的其荦荦大者，是马路上的小轿车太多太拥挤，有时竟然是近在咫尺的目的地，车子要开半小时才能到达，公共汽车是寸步不让的，往往要超车，大车

欺小车，霸气十足，小轿车大都是职工们自己开的，因车子太多，撞车事故不断发生，致使交通警大伤脑筋。有的出租车又不打灯记数，乱开价，驾驶员凭着自己高超的开车技术，向乘客们敲竹杠，这使我们最为恼火……

（四）

在商展中，我是参加文化部分工作的。这一部分有书画、工艺、声象、文化服装等。我们都是来自各省市的文化工作者或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干部和专家，大家聚集在一起，又陌生又是一见如故。虽然我们都互不相识，只要接触到文化艺术的专业，大家都说个没完没了，像老朋友一样格外亲昵。

中国书画和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华夏文化特有的艺术特色，璀璨的中国美术珍品矗立于东方艺术之林，甚至在世界美术领域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而更引起了国际艺坛的瞩目。

由于中国书画艺术和工艺品，在朝鲜人们的心目中有着相似的艺术语言和共同的艺术传统，也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中国艺术家有那么多的高档次的艺术精品来汉城展出，所以，那里的观众看了我们的书画作品和工艺品后，打心坎里喜欢，有的观众看了我国的工艺品，都目瞪口呆了，他们认为这些工艺品是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都说“这是具有超时代的艺术魅力。”观众最感兴趣的最好奇的是一只缩小仿制故宫皇帝宝座的鎏金工艺品，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艺术珍品，原来中国古代皇帝宝座如此华贵和壮丽，这是世界之最了，古代东西方任何国王的宝座都不能与中国皇帝宝座相比拟的。

使我很感激的是，许多外国朋友看了我的人物和花鸟画都

很欣赏，有的流连忘返，细细咀嚼画中的内涵，有的点头称赞，与我合影留念，有的问长问短，与我攀亲道故，更有的知音者与我谈论中国画的伦理人格的表现以及中国画的未来趋势。也有的还来我的住处详细了解我所走的艺术道路。他们说：“先生的画既纯情又浪漫”，“耐人寻味，富有时代感。”这使我怦然心动，真没有想到在一个异国他乡的都市里，我的艺术成果能得到南朝鲜观众的喜爱并博得他们的赞许，这对一个画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欣慰和鼓舞，同时也鞭策我今后应朝着那一方面去求索、奋进。

(五)

在展览会期间，有一位画家叫闵庚灿先生偕夫人特地来访，这是多么令人欢欣的事啊！我们在展览会上寒暄几句后，他俩邀我到他的画室里作客，他的夫人李淑芳原在浙江歌舞团工作，闵先生原来是以浙江话剧团回南朝鲜的。闵夫人忙着沏茶倒水，殷勤招待，我们畅谈了各自的艺术生活。究竟闵先生何许人也，他的身世怎样？说来话长了。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他都在杭州愉快的度过。这里只能长话短说了。

他过去在杭州时，我们都以“小朝鲜”呼之，他的老家是离汉城不远的仁川市。

正是国际反法西斯等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不久，他在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悄悄地来到仁川港的美国军舰上玩耍，因疲乏不堪竟在甲板上睡着了。这艘舰上的水兵却没有发现他，就离开仁川港驶向中国的南京等地，于是这位“小朝鲜”也随着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陆。后来美军水兵发现了这位“小朝鲜”，只好设法把他送给南京一个由美国人办的教会里收留

起来。不久那位收留他的美国牧师要回国了，又托中国友人在杭州扶养，直到“小朝鲜”读完初中为止。解放初，他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几次盼望有朝一日返回南朝鲜老家，谈何容易，他的向往都成为泡影了。由于抗美援朝开始，国内外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他不能回国，他想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因“身份”不明，被拒之门外，后来，只得在杭州长期落户了。由于他喜爱绘画艺术，经常出入浙江美术学院，并不断求教于我们的老师。这样，我和他才渐渐相识了。他一直呆在浙江话剧团等部门搞美术工作，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之久。他经历了不平坦的生活道路，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对中国画勤奋好学，颇有成果。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后，他又提出回国与家人团聚的请求，后经多方交涉才办理回国手续，终于在1983年回汉城，不久就恢复了国籍。当他刚刚到达汉城不久，闵先生的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和曲折的艺术生涯，已成为南朝鲜的一个新闻人物，当时名满汉城，传闻颇多。

他现在已是五十六、七岁的中年画家了，生活得挺好，艺术上也不断革新，不断长进，在汉城的美术界中，闵先生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画家了。他的宽敞而精致的画室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既是创作室又是学员的教室，同时也是接待四方来客，切磋技艺，开展学术活动的好场所。闵先生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生我的家是韩国仁川，养我的家是中国杭州。”他深深感到杭州已成为他的第二家乡，杭州美术界的老朋友和美术学院的老师们，都使他永远难忘，铭记在心，他牢记高尚的情谊，也思念师长的栽培，更是念念不忘养父养母的关照和养育之恩。自己在杭州度过了整整三十八个春秋，光阴荏苒，一晃而过，回忆往事，都历历在目。他希望今后能争取机会，经

常回杭州和大家相聚，为沟通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尽绵薄之力，办一点实事。

我们在汉城呆了三个星期，只有在暇时上街逛逛马路，见见世面，但对整个南朝鲜的建设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作出估价，恐有“盲人摸象”之嫌。即便看到的也只不过表面的现象。

现在，他们正在努力争取南北朝鲜的和平、自主和统一，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朝鲜人民一定会实现这一愿望的。

1991年11月於杭州

作者介绍：叶尚青，男，本县城关镇东岙里村人，现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花鸟画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浙江画院、西泠书画院、杭州画院特聘画师等。其艺术成就已载入《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现代画家年鉴》等。



访 日 杂 忆

董楚平

1991年5月25、26日，日本“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佐贺县鸟栖市举行，会议又名“日中友好佐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古代日本文化与吴越的关系。会场上悬挂中、日两国国旗。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驻福冈领事馆共有四名外交官员参加会议。我国中央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曾对会议作过报导。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安志敏教授、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毛昭晰教授，还有我，共三人。

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外越与古代日本的关系》。外越指海上越人。玉环三合潭遗址很可能是外越的文化遗存。因此，我出国前写信给玉环文管会王元良同志，请他提供三合潭文物照片。承他热情支持，寄给我十多张新拍的彩色照片。面对这些珍贵的送行礼物，我急于向外界宣传故乡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5月21日，我怀着一片乡情，离开祖国——从上海飞抵福冈。

日本列岛主要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四个岛屿组成。九州岛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端，与中国相距最远。福冈在九州北部，是日本第七大城市、九州岛第一大城市，人口一百三十多万。从上海飞抵福冈，只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比上海到北京还近。佐贺县在福冈南面，与中国距离更近，古代日本

派遣使节来华，多从佐贺一带入海；据传我国秦朝的方士徐福也在佐贺登陆。佐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门户。

我与毛昭晰教授下飞机后，要经海关检查。日本海关人员看了我们的签证，知道我们是来参加学术会议，竟不作任何检查就通过了。负责接待工作的久富正美先生与翻译伊藤友子女士，已在门外等候。我们四人分坐两部出租车进城。当时正值下班时间，进入市区后交通阻塞，小汽车排成长龙。我们的下榻处是一座新盖的宾馆，稍事休息即在宾馆内的中国餐厅“大观苑”吃饭。

5月22日上午，我们先到志贺岛参观“金印公园”。志贺本是小岛，现在已与九州岛联成一片。据中国史书《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女王遣使来华朝贡，光武帝（刘秀）“赐予印绶”。1784年2月23日，志贺岛一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偶然掘得一颗金印，随即献给政府。此印边长七分八厘，高三分，上有蛇纽，高四分，重二两九钱，刻有篆体阴文五字：“汉委奴国王”。这颗金印证实了中国史书的记载，是中日官方关系的最早、最确凿的物证。为纪念这一重要发现，现于志贺岛建立“金印公园”供人游览。公园沿山而建。山下入口处立着高大的纪念碑，碑文是“汉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上山后就可以看到一块很大的大理石，仿刻金印文字“汉委奴国王”。“汉”字单独一行，“委奴”与“国王”各一行。根据印文的意思，委奴国属汉，是汉的属国。今天看来，这似乎是大汉族主义，但在古代世界里，这毫不足怪。日本人民尊重历史，把它仿刻出来公之于众，并无什么“精神压力”。这种胸襟，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这颗金印，我只觉得中日关系源远

流长，并无什么特别值得骄傲之处。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我们的祖先已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业绩，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还得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未可“吃老本”。

22日中午，稍事休息，即出发到一家豪华的中国餐馆用餐。餐馆门楣上挂着一块黑色的匾额，横书四个苍劲的大汉字：“广州酒家”，两旁的门联是：“食在广州，口福有朋。”书体是小篆。匾额与门联的书法都堪称上乘。进入大门，里面又是中国式的园林，我们在一个单独房间里用餐，房门口是“大观苑”三字，给人以仍在中华文化圈的感觉，虽然出了国界，并没有很多离乡背井之感。以后，主人经常请我们吃中国菜，据了解是他们自己喜欢吃中国菜。就我们而言，倒喜欢多吃些西餐与日本菜，即多开些“洋荤”，多尝些异国风味。

5月22日中午，安志敏教授从北京飞抵福岡，下午，我们一起去参观吉野个里遗址。

吉野个里遗址位于佐贺县神埼町与三田川町之间的吉野个里丘陵。吉野个里遗址是日本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弥生文化遗址，也是日本近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弥生文化时代是日本的青铜文化时代，也是日本稻作文化开始盛行的时代。它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延续至公元三世纪。弥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吉野个里遗址南北2500米，东西300~500米，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这么大的遗址，竟然全部加以完善的现场保护。自1989年1月开放参观以来，到1991年5月为止，在二年多时间里，已有四百万人来此参观。这个数字，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这个数字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自己民

族文化的重视与爱护。我们参观的那天，不是假节日，却到处碰到成群结队的参观者。不但有校服整齐的学生，而且有鬓发斑白的老人。佐贺市电视台对我进行现场采访，问我有何观感。我说，吉野个里遗址规模大，保护好，我已有所知；唯参观者如此之多，出于我的意料；我对日本人民的文化素质之高，深感钦佩。采访结束时，记者告诉我，今晚6时12分将开始播放这次采访，请我准时收看。晚饭后，我就守在宾馆房间的电视机前，只怕他们提前播放。但是一直到6时12分才出现吉野个里遗址的镜头，大约二、三分以后，就看到记者对我的采访。他们的准时，令人钦佩。

23、24日，我们先后拜访了佐贺县政府、佐贺市政府、诸富町政府、鸟栖市政府，得到这些单位领导人的接见。接见时，茶几上都插着中、日两国国旗。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直属中央政府。县政府的首席官员称“知事”，与我国过去的称呼一样。

这两天，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文化古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对徐福的重视。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派徐福率三百“童男童女”出海，传说徐福到了日本就没有回来。徐福到日本，先从佐贺的诸富町上岸。日本的町，相当于我国的区或乡。23日下午，我们到诸富町政府访问。町政府客厅里悬挂着徐福画像，立着徐福塑像，摆着许多研究徐福的书刊。我一篇研究徐福的论文，那里也有。主人向我们每人赠送一座徐福铜像。座谈会后，町政府领导人陪我们去参观“金立神社”。金立神社是徐福庙，每年5月3日，当地群众要举行盛大的庙会。5月3日是我的生日，恰巧之极！

5月24日晚上，举行预备大会，日文称“前夜祭”，实际上

是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福岡、佐贺一带的知名人士欢聚一堂。鸟栖市市长及其夫人，也登台献歌献舞。我当时觉得奇怪，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前夜”，为什么要“祭”如此热闹？到了第二天，这疑团就完全冰释瓦解了。

25日上午八时，我们从久留米市的宾馆出发，驱车到了鸟栖市文化会堂。工作人员在门口出售会议论文集。论文集印得很漂亮，图文并茂，照片都是彩色的。我的论文是1990年12月底才寄给他们的，开会前就印出来了。会议入场券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售一空。每张入场券2000日元（折合人民币80多元）鸟栖市文化会堂有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会议只开两天，但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个人上台作报告的是四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梅原猛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隆康、毛昭晰教授和我。除个人报告外，还有几次小型座谈会、学者答听众问等。小型座谈会是五六个学者上台，针对共同感兴趣而看法不同的问题，面对听众公开辩论。某学者发言时，银幕上就出现他的形象，使台下听众看得一清二楚。25日下午，七位学者上台答听众问，类似记者招待会。日本人喜欢吃绍兴酒，有一听众想知道越国的酒文化。会议主持人问我能否回答。我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当场作了解答。

台下的听众是从各地赶来的学者、官员、和尚等。有一和尚带太太参加会议（日本和尚可以结婚）。

鸟栖市、久留米市都是小城市，宾馆铺位不多，以至客满为患。我们三个中国学者在日本期间，平时都是每人住一个双铺房间。只有25日那天，因中国驻福岡总领事临时通知要来参加会议，而当地宾馆已无铺位，日本学者是四个人挤一个房间，因此东道主只得请我暂时搬到毛昭晰的房间里“委屈”一

夜。他们为此一再表示抱歉。其实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双铺房间住两个人是天公地道的事，有什么可抱歉呢？令人惊奇的倒是学术讨论会如此轰动社会，颇似我国农村的集市、庙会，以至要买票入场，宾馆暴满。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开会前夜，要举办那么盛大的鸡尾酒会。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民文化素质之高。

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个中国学者根据各人的需要，分头活动。我先后到下关、奈良、京都、东京等地参观、访问、讲学。

下关原名马关，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接待我的是梅光女学院大学的国分直一教授与木下尚子副教授。一年前，他们曾应我之邀，来杭州参加“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一天前，他们刚参加东亚文化交流等讨论会。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很随便。国分教授已83岁，过去曾长期在台湾工作，是台湾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博学而谦虚，对后辈十分爱护。这么大的年纪，陪我跑了一天。我多次劝他先回去休息，让木下一人陪我，他却要坚持到底，使我很不好意思。下关是个海滨城市，颇像坎门。我到下关，看到大海，迎着海风，真有回到家乡的感觉。听我这么说，他们都非常高兴。当听说玉环靠近温州，大家更是兴奋。在一起共有五个日本朋友，他们都知道温州的大名。他们对温州人的思想开放十分钦佩，但也知道温州的假冒商品很多。下午，由于我主动要求，他们陪我去参观“日清讲和纪念馆”。纪念馆面海建筑，原是马关最漂亮的房子，《马关条约》就在此签订。现在这座洋房已改为高级餐厅。纪念馆的主要展品搬到底层一间小厢房里，厢房门口钉一块不显眼的小木

牌，用毛笔写着七个字：“日清讲和纪念馆”。平时不大有人来参观，我们参观时，也未遇到别的参观者。要不是我主动要求，他们是不会安排到这里参观的。参观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日本朋友的心情也不轻松。大家都默默无言，原来的活跃气氛似乎突然凝固起来了。步出门槛，迎着海风，凝固的气氛才渐渐融化，像春风解冻似的。木下女士笑着问我：“现在中国人中，还有没有称我们为‘日本鬼子’的？”我也笑着说：“当然有的。不过主要是一些老年人。例如，我这次访日前，80岁的丈母娘就劝我不要来，她说日本人很凶。”他们听了，都象我一样大笑起来。

奈良与京都是日本两大古都，古迹很多。政府规定，这两座城市不准造高楼大厦。京都现在还保留佛教寺庙三千多所，神社（日本土著宗教）一千多所。在京都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寺庙与神社。身临其境，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日本农村几乎看不到“火柴匣式”的西式楼房，都是一、二层的、保留东方特色的民居。房子里面当然有现代化设备，而房子外表却是古老的民族形式。日本人相见、临别，都行鞠躬礼，不握手、扬手。鞠躬是中国固有的礼仪形式，握手与扬手原是欧洲人的习惯。现在，中国式的鞠躬，只有日本人代我们保留着。我在日本期间，也学着鞠躬，未与人握过一次手。但一回到鞠躬的故乡，就不得不与同胞握手。如果鞠躬，咱们这些鞠躬的后人一定会笑我“洋化”。日本是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但对传统文化却又如此重视。可见，要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破坏传统文化为代价。

30日下午，日本杰出的汉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已奈

夫先生，约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教授的研究室里见面、座谈。毛昭晰教授出于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大学者的敬仰，也来参加座谈，並介绍了良渚文化的一些新发现，引起林已奈夫、松丸道雄的很大兴趣。林已奈夫把自己的新著《中国古玉之研究》送给毛昭晰教授与我。此书资料丰富，见解独到，印制精良，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中国古玉的集大成著作，定价高达38000日元，折人民币约1500元。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珍重，由此可见一斑。

5月31日下午，我到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学。学习院大学原是皇族子弟学校，抗战期间“满洲国”贵族子弟（例如傅杰），就在这里留学。由于是贵族学校，所以环境很优美，古木参天，空地很多，论景色，居东京各大学之首。日本称“东亚”为“东洋”，主要指中国、日本、朝鲜。日本文化受中、朝影响很大，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很难脱离中国与朝鲜，作单独研究。只能把这三个国家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个整体就称“东洋”。日本很多大学都设有“东洋文化研究所”，开设“东洋史”课程。日本当代天皇的王子秋萩宫先生，才28岁，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学的是生物学，但酷爱中国文化。他的外祖母童年在上海度过，至今能讲流利的上海话。秋萩宫先生酷爱中国文化，可能与此有关。那天下午，他原拟赴会，临时因故未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研究会理事长小岛晋治先生，十年前与我相识，那天也来赴会。他的莅临，为我增色不少。那天晚上，小岛与原岛两位先生请我到“中央饭店”吃饭，中央饭店是高级“川菜”餐馆，但烧的菜一点也不辣，与真正的川菜完全不同。大概他们既能烧很辣的真正川菜，也能烧不辣的一般中国菜，由顾客自定。原岛先生

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过五年，回国后当过秋萩宫的中文教师，是十年前与小岛一起在广州与我认识的，现在学习院大学执教，是他邀我讲学的。一起吃饭的还有三位青年学者。我送给他们玉环剪纸，以作纪念。按日本惯例，邀请外单位学者讲学，当天要请他吃一餐饭。讲课费由单位支出，饭钱则要邀请者自己掏腰包。

6月1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上海，当夜回杭州家里，比玉环到杭州还快一些。

我在日本期间，一有机会就向日本学者介绍玉环三合潭遗址。现在，有两本高规格的日文学术刊物，提到咱家乡的古文化遗迹：一、《日中文化研究》第2期第33页，勉诚社1991年10月出版；二、《东亚古代文化》第70期第108页，大和书房1992年1月出版。遗憾的是，三合潭遗址未经科学先掘，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三合潭文化遗址恐怕不是孤立现象，但愿今后能发现第二个、第三个三合潭，出现与日本、台湾相似的文化遗存。

作者介绍：董楚平、男、本县坎门镇人，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浙江省中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明日黄花话访苏

——访苏追忆

尤俊意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苏轼：《九日次韵王巩》

作者小序：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统一而完整的政治实体，苏联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回想去年年中我访问苏联的一些所见所闻，历历在目，感触良多。《诗经·大雅》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或许我们可以从“忽喇喇似大厦将倾”之中感悟到某些值得借鉴或玩味的东西。是故不择巨细，不避孔见，逐一追忆，以飨读者。

根据同苏联科学院为期三年的科学文化交流计划，上海科学院学术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991年6月11日飞离上海，踏上了访苏的旅途，7月1日莫斯科河的夜景把我们送上了归程。团长是院党委副书记兼人文社会科学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团员有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兼新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情报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还有我——法学所的所长助理。

一、行前准备

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张机票价为1,000多美元，而一张车票

仅为1,000多人民币，差价5至6倍。为了节约开支，同时也为了领略一下国际列车的风味和西伯利亚的风光，顺便目睹一下欧亚大陆的分界碑，我们决定乘车去、乘机返。每周有一趟国际列车满载着中国人以及东亚各国地区过境者从北京出发，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直至莫斯科，同时相相对开一列满载着中国人和苏欧各国人从莫斯科到北京。因此列车全名为“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全程8000多公里，标准耗时五昼夜零四小时。

按国家规定，我们在列车上每人每天有7美元的就餐补贴。既为了节约，也由于口味，一般中国人行前都备足了方便面、粟米粉、罐头、水果等，以便车上自给自足，毋需到餐车上吃价昂味劣的饭菜。因此我们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并不多，累赘的便是食物，好在一路上吃过去，人将到而食将尽。

听说苏联盛行小费送礼之风，我们对此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比如对司机、陪同、导游、服务员、访问对象以及随遇的不特定对象，都得备一些小礼物。据说那里客房里不备热水瓶，外国人一般都到餐厅喝冷饮，中国人要喝茶只有自带电热杯，或者向服务员借茶壶，这就需要公关的学问和礼物的润滑。礼不在重，有物即可。当然要有中国的特色，人无我有的东西，比如：清凉油、风油精、花色指甲钳或精致旅行剪、小儿装饰电子表、保暖杯、套盒香木扇、别致的原子笔、名牌香烟、中国名茶、丝绸头巾、中国书画等等。由于礼物费按规定仅有200元，加上各人所在研究所追加一些，也有限得很。为了备齐价廉物美的礼品，几乎花了足足2天的时间。尽管知道他们很看重珍珠项链，哪怕是“大兴”货；由于时间关系，不及细觅而暂付阙如了。此外，还带去了上海市花徽章、带有院标

的小礼旗。

二、车窗外的风光

6月12日早晨7点40分列车准时出发，出北京沿西行折向山西大同，往北经内蒙集宁折向西北。一路上随着火车轮子特有的“铿隆铿隆”声响，窗外一片片绿色庄稼、树木，伴随着一座座的砖瓦木头房，静静地映入眼帘。人们都说北方土地比南方差多了，但这次车上并不见“一片黄土地”，也不见荒山野地，只见得精耕细作的农田一排排、一畦畦，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不错的咧。

列车当晚10点40分靠上了二连浩特站。这是我国北部边境重镇，进出中蒙国境的海关城市，地处内蒙中段北部，蒙古的东南侧。火车必要在此停下，完成几大任务：一是将窄轨火车底盘换成宽轨火车底盘；二是卸下中国餐车；三是让一部分过境者或边民乘车去蒙、苏；四是履行一系列的海关出入境手续，又是查护照、填写出境海关税单（包括行李件数、随身所带外汇数、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又是填卫生防疫单，烦得很。老客们说今晚别想睡觉，这边查了那边还要查，明晚进出蒙苏边境还要折腾一宿；乘飞机省事多了，但乘火车毕竟便宜，而且大包小包尽管带，没有像飞机那样严格的数量限制，据说每次总有少数人因违反规定而被撵下来。我们第一次出国门，大家警惕性很高，也谨慎得很，每人腰上缠了一只腰包，专门放置现金、护照甚至小型照相机，主要行李都锁好。因为时间有的是，而且临别祖国大地，未免有点依恋，都想看一眼边境都市的夜景，于是都下车到站上一座大楼的旅客休息室休息，看

电视或买些零碎，一时间熙熙攘攘，倒也热闹得很。但这里的東西要比北京略贵一些，比如“二窝头”北京一瓶2.5元，这里要3元。

通常情况下，列车在此停留2个小时，但那天不知何故，停了近3个小时。凌晨一点半驶离，10分钟就到了蒙古境内的扎门乌德小镇。只见蒙军一位军官带几位边防战士上车检验收取了各人护照，又填了一些单子，火车挂上蒙古餐车，然后往西北方向直去蒙古首府乌兰巴托。

由于昨晚的折腾，也因晚上看不见沿途景物，故大家倒头便睡，直到13号早晨才纷纷起身欣赏蒙古境内沿途风光，特别是想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令人失望的是，所过之处，几乎无一值得看的东西。满目夹杂着石子的黄色沙土、土块、土堆，地不成田，树不成行，一片不毛之地，所见青草均为稀毛癞痢似的，偶见几处农舍也是凋敝得很。

下午4点钟光景，火车晚点3个小时后驶抵乌市。乘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大家抱着好奇的心情下车看一看异国的首都。由于车站离城区太远，看不见什么，只见站前场地上，人群集聚，随时流动，大多为青少年。看见外国人，特别是蓝眼黄发的欧洲人，都要围过来试图做些什么交易。但是大家看见这些形象欠佳、衣衫不洁的人，都有意回避，以免得不偿失。有一位金发碧眼少妇因调换小钱币而被挤围着，好不容易才在同伴帮助下解脱出来。蒙古人身体很棒，走起路来咯蹬咯蹬，挺有精神的。为了留念，我们各人在列车旁摄影。临上车前，果然看见二位警察挟持着一位青年拥进站台大楼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便急急上了车。

乌兰巴托地处蒙古中部偏东北，火车离此后北上苏联。使

我惊奇的是，从乌市到边境这一小半路程的沿途所见跟昨天大不一样了，林木、花草、庄稼、土地、房子都不错，想不到同一国度里东西、南北之间竟有这么大的差距！出蒙境前，海关人员上车发还每人护照，边防检查人员上车检查了一番行李。一阵忙乎后，不一会列车进入了苏联国境。自然，又换上了苏联餐车，挂上了一节苏联客车。按常规，海关人员上车检查行李物品、填写税单，边防人员检查护照。这是最后一次折腾了，列车将在苏境内疾驰三昼夜，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想想二次进出国境的麻烦劲，真够呛。据说有两个老外在检查中被留了下来，而我们原本最担心的两个北京青年，带着好几大包行李物品，摆满了床铺，填足了床下空档，走道，连睡觉都没地方，却不知怎么给糊过去了，安然无恙地闯过来了，只听说塞了检查人员的一些什么东西。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系因公出国组团人员，故而检查起来最快最利索，毫无麻烦。与我同室的一位河南青年（系取道苏联到匈牙利），就两次遇到了麻烦。一次在二连浩特，说是签证日期已过，被带下车核查，临下车前他说：糟了，如果被拉下来可怎么办？出不了国也回不了家啦。好在最后被放行。第二次是苏联女海关人员对他随身带的行李箱特别是一个密码箱的东西盘查得紧哩，里面全是珍珠项链、耳环、胸针、头饰、风油精与清凉油等。还查了他随身带的钱币。好在他英语讲得流利，对应也麻利，都给应付过去了。最后他送了两小瓶清凉油和一根项链给她，她笑笑，不好意思地收下了。

列车在苏联境内高速前进，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白桦树在窗前闪过。透过层层行道树的缝隙，可见一片片的绿色草原，我们犹如行进在绿色走廊里，舒服极了。我不由好奇地一路跟踪

观察，这林荫大道何处是尽头？令人惊叹的是，绿色世界无尽处地延伸着、延伸着。在草原中不时出现一丛丛黄白相间的小花。我们国内铁路沿线一般都种有庄稼，故我特别留意铁路旁的农作物。很奇怪，在几天的行程中，只见到两处大约相当于一节车厢面积大的马铃薯枝枝叶叶，栽种得整整齐齐。

列车到了乌兰乌德后就开始向西行进了。然后沿着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的南端绕着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湖面很大，湖水碧绿碧绿，清澈得很。有几处地方停泊着彩色小游艇，有几处垂钓者在耐心地静候鱼儿上钩……

列车终于好不容易绕出了贝加尔湖的影子，靠上了中部西伯利亚南端的有名城市伊尔库茨克。这是苏联通向西伯利亚的重镇，也是过去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一大集聚地。然后列车往西北方向而去，到了通向西伯利亚大腹地的两条铁路的交汇口——泰谢特，在苏联贯通东西的大动脉上沿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此时窗外的路标已是1,700多公里了。我想大概已到了欧亚大陆的分界线的地段了。

为了不致错过这个有意义的时刻，我赶紧向列车员询问：“分界线在哪儿？”他操着北京话说：“就要到了，路标大概是1,777公里吧。”于是我扒在窗口，一眼不眨地盯着路标数数，一直数到了1,777公里处。果然在路南微微隆起的小土坡上树有一碑灰白色的界石，望过去（面东）是俄文的АЗЦЯ（亚洲），望过来则是ЕВРОП（欧洲）。啊，这就是欧亚分界碑！想不到小小的界碑却是地球上两个大洲的分水岭，这一瞬间，我们就从亚洲跃入了欧洲，时间是多么短暂啊，犹如人生和历史，空间又是多么狭小啊，犹如超级外星人两脚跨着两个洲。

我在随身带的卡片上记下了这个颇有意义的标志。这就意味着，列车只要通过喀山，目的地就不远了。

于是我尽心所欲地观赏着两边大草地中时而出现的一大片一大片木屋了。大多为平房，有的有阁楼，人字形尖顶的居多。随着列车西行，小木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繁，颜色也由原色变为彩色，好看得很。我又去问列车员，这是什么人居住的？他说，有的是森林工人住的，有的是城里人的度假别墅。

17日晚上10时半，我们终于随着列车到了莫斯科。遗憾的是，因为夜晚，无法看清莫斯科市火车站附近景象。正常的话，应在中午12时到，现在却整整晚点11个钟头。随着苏联科学院国际共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潘佐夫的一声“欢迎”，我们从北京到“赤都”莫斯科的陆上旅途，经过5天又15个小时的颠簸，终于结束了，“乌拉”！

三、列车上的“倒爷”

百闻不如一见。

早就听说国际列车上近年来“倒爷”的买卖活动由暗而明，愈发厉害了。因此我们早就做好领教车上倒爷的心理准备，看看到底怎么个“倒”法。

一入蒙古，就有蒙古人上车来兜售东西。但东西不多也不俏，贩子也少，几次反复看见好像是一对母女模样的人来回串门买卖，但成交者不多。待到了苏联境内就热闹了。

先是上来三个青年人，体格健壮，动作极为麻利老到，一进门随手拉上门，于是就一面亮出包袋里的货色，一面叽哩呱拉谈交易。有用英语的，但大多用俄语的。乘客们判断，有的

是苏联当地人，有的是波匈一带东欧人。每到一站，总有新货郎上来，大多2人或3人一伙，也有单挑的。几个站头观察下来，我们已一致得出了结论：这些倒爷，一面将苏联商品以国营零售价或批发价购进，高价售出；同时又从外国人手中购得或换得紧俏商品，下车后在国内以高价脱手，从中渔利。怪不得这些倒爷一般来说外表堂堂，衣着不错，因为手中赚了钱嘛！而苏联国内的交通费是特别低廉的，因此一天换乘几次车用不了多少钱。后来我们在访问中对此得到了证明：这些人在戈氏的改革过程中首先得益发财致富，因此引起正宗劳动者的不满，加剧了人们在社会分配上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洋倒爷们都带些什么货物上车呢？大同小异，以手表、剃须刀、照相机、望远镜、工艺品居多。也有一位50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行动斯文，专卖装在盒子里的古钱币及工艺烟嘴。当然，这些东西对一般中国人没有吸引力。我很同情他，想来他的生活日趋拮据吧，不得已才将自己平时苦心积累的东西卖掉。但要买这些东西，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爱好、识货、有钱。

当然，倒爷们也很愿意以物易物或以钱易物，买些在苏联市场上走俏或匮乏的中国货，如牛仔衣裤、时装、T恤衫、旅游鞋、旅行包袋以及妇女饰物。甚至还动员我们将自己带的包、穿的鞋卖给他们，出价往往是原价的5倍以上。当然我们是不会干的，尽管后来在莫斯科街头旁还有人要买我们的东西。

买卖东西的语言不在多，而在于货物中意、互相会意，故语言不通也不要紧，稍通外语的更不成问题了。几个福建同胞用手指比划，嘴上讲着中国话，夹上个“卢布利”（苏联货币

的俄语发音)或“道特”(美元的英语发音),经过讨价还价,三下两下就成交了,皆大欢喜,大家都感到获得便宜货。如果要讲解货物的性能时,就需要有人从旁翻译了。

如何买卖双方都感到“卖出了好价钱”或“买到了便宜货”呢?这跟中苏两国的市场价、黑市价以及货币兑换率有关。倒爷的获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里改革开放已有10年,市场繁荣,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吃穿用已不再短缺。而苏联市场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他们乘机倒手转卖以渔利,差价成倍甚至几倍。旅客们如何也感到合算呢?因为苏联货币卢布与美元的贸易比价原为1.8:1,由于苏国内经济衰退,硬通货严重短缺,拚命鼓励外汇入境,于是国家的旅游比价却是27:1,而黑市价则是30至40卢布换一个美元(通常在35卢布左右)。在我国,一美元仅值5至6元人民币。这就是说,人民币一下子升值15倍,卢布贬值为1/15。如果用所换到的卢布在苏联花费,那不感到太合算了吗?比如一件质量上乘的苏联呢长大衣,涨价前为200多卢布,涨价后卖到600多卢布,够惊人的,但也不过20个美元,等于100多元人民币,岂不便宜?

正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利可图,所以中国过客中也大有倒爷在。比如这趟车上除了右前邻几个房间住着路过苏联的老外基本上不大精通此道外,在我们左后邻的一排客房中以福建、北京人居多。仅三明地区就有40多人。他们大多是路过苏联到东欧去的,主要是匈、捷。去干什么?据他们自称是早先过去的同乡人介绍去帮助做生意的,也有的是花钱搞到非洲某国的签证后,其实是到东欧去,或者经东欧转去欧美。路上顺便捎些中国货便可轻易地把往返旅游费都赚到了,因此都是大包小包。特别是那几位北京人,几大箱子里几乎都是打算抛售或交

换的货品。一路上,他们一方面跟洋倒爷互相交易,另一方面每到一站必在窗外抛售货物。沿途苏联公民的确纷纷来窗下讨价购物,从服装、口香糖、泡泡糖到老白干,什么都要。因为对他们来说,能搞到这些商品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或许他们之中也有人再去倒卖赚钱。

乘客中也不乏富有同情心的人。如一福建女同胞(跟随丈夫赴匈)不忍心赚苏联人特别是小朋友的钱,几乎都把口香糖分抛给车窗下那些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了。

四、车厢内外

不知何故,我所在的房间,两边上下铺4个床位只有3个人,这就给我们安放东西、接待来访提供了方便。我的下铺是一位三明市的公民。他初中毕业后,当过泥匠,开过个体书店,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名著,故对当今作家及其作品十分熟悉,对创作与生活也能谈出点名堂来,因此我们还是有一部分共同语言的。他不象其他同乡,只顾贩卖东西赚钱,而是休息、谈天,并且盘算着到了东欧后的活计。他妻子在老家开了个体服装店,有了钱,不喜欢他开书店,于是他就一个人出国闯天下了。在整个旅途中,的确,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只道吃喝,言不及义,他尽管学历不高,却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对面上铺是一位年轻的大学肄业生。他来自河南,原在外语系念书,2年后即退学钻出国门路。现在他要去在匈牙利经商的朋友处,一面当翻译,一面伺机有所作为。他英语好,就常为福建老乡当翻译,也与隔壁几位荷兰、英国籍的老外拉呱

拉呱。开始时我见他讲得并不怎么流利，有点紧张，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直接与老外打交道。后来看见这些老外也不过如此，朴素无华，也不怎么富有的模样，于是心里也就踏实镇静，越讲越顺利了。数他带的东西最多，2只特大号箱子，外加一个大背包和一个手提箱。我真佩服，他一个人是怎么上下车以完成跨越几国的大旅行的。二连浩特那夜被海关人员带下车进一步核审护照与签证时，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看看他每餐大口大口地吃着用刀一块块切下来的大块压缩火腿肉，真是味道好极了。

常有三三两两的福建同胞来我室打坐。言谈中不外是生意、打工、赚钱的事，也偶而谈些所见所闻的国外趣事。一位小老板向我问起在国外同别人合伙经商贷款的有关法律问题。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轻（我看过20来岁）的小伙子，满脸中学生的稚气，10几岁起就在上海为别人站柜台，赚了些钱，这下子想远走高飞了。他的话最多，也最咋呼，老是一手抖着自己带来的那套牛仔衣服，一手用指头比划，嘴里就只有“卢布、卢布”和洋腔的“很好、很好”了。

那位富有同情心、向苏联小孩散发口香糖的少妇，是40多位福建旅客中3位妇女之一。白晰的脸庞，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笑起来两个酒窝非常明显。身体匀称，穿着也得体，有着一般福建妇女所缺乏的那种秀气与丽质。交谈下来，她是南下干部的女儿，才20多岁，是跟在匈经商的丈夫而来的。因为他们每人为出国远行需花费2至4万元，所以一坐下来就向我们诉说他们当中有人如何如何无信用、骗人钱、到了国外不知如何是好的秘闻。她那位手戴几只戒指的丈夫来了，一脸的大男子主义派头，劈头就是一句脏话，然后呵斥着叫她回房里去，

叫她不要“嘴臭”，她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我们大家都感到有点过份了，但也不便于说什么，女色就是如此被金钱驱使着……

每到站头，大家都想下来走走、看看。站上小商店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少量面包、果汁或鸡蛋。那果汁是连瓶的大容量，价不贵，但味道不行。有的站头也有些农民模样的人摆着西红柿、土豆、萝卜、黄瓜之类的小产品。

由于火车轮子出了毛病，我们在一个小站停了一段时间。我仔细瞭望站北的一个小村庄：房屋分散，男女老少的穿着较整洁，没有特别寒碜的。少女很可爱，打扮得也很好，只是老年人的穿着明显较差。有几辆自行车在骑过。有一座横跨铁轨的人行天桥，这是我在苏联看到的唯一人行天桥，因为大城市市区均是地下通道。

在一个叫施拉姆的地方小站，外墙上嵌挂着一块铜招牌，上面写的是此站以列宁命名的铁路运行多少周年纪念。站外小广场上还树有一尊列宁的全身塑像。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一个小站上的事。有好几家子人（主要是老年妇女和儿媳及坐在推车里的孙儿辈）好像是在等上车（与我们车停在平行的轨道上）去走亲戚或度假去。我们正在月台上踱步。我正在同坐车里那可爱的小孩逗着玩，那位善心的福建妇女也过来把泡泡糖塞在小孩的手里。有一位60岁左右的胖妇人主动与我搭话，问我是否中国人。我说是的，她竖起大拇指称夸道：“你们中国人是大大地好人，咱们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友谊”，边说边用双手互握加强语意，面部表情也很激动、真诚。我边点头表示赞同她的观点，一边不断地用俄语“是的”和“说得对”来和着她的话。

旁边另几位中老年妇女也和着她的话向我表示好意。她说着说着，眼眶逐渐红了，有了泪痕了，便掏出手绢揩拭着，我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为了不使自己流出泪来，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临上车前，她突然跑过来，伸出温暖的双手，同我紧紧地握手。我向她表示谢意，并祝她们每家子一路平安。这个动人的镜头，由于照相机没有随身带而未能拍下来，令我遗憾长久。后来，在整个访苏期间我们都深深感染到中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这种感情，在一些中老年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和真挚。年轻一代虽然对我们也是友好的，但总缺乏那股子热情，正像我国青年看待中苏关系那样。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历史都有它的一定局限性的。

当我们在莫斯科下车后，月台上的手推车穿梭来往，好像是个体户（后来才知是集体性质的），随时可以为您服务，但要价是你心中无数的。好在潘佐夫已叫来拉车的，价钱当然是讲定了的。我们一路上跟着拉车并帮着推车，走出了站头，入了站前的广场，接我们的车子就停在这里。由于当天下了一场大雨，那天晚上站前广场的路上也是坑坑洼洼，好些地方有积水，脚上新皮鞋溅得一塌糊涂。看来，月亮也并非外国的圆。

五、参加两个国际会议

此行赴苏主要是进行学术访问。根据原协定，访期2周，一周民主德国、一周苏联，两德合并后，2周均为访苏。我方原提出访问对方11个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一个企业和一个农庄，由于时间和苏国内的情况，最后确定访问7个研究所和1个图书馆。虽说有3周时间，但一周在路上，故实际还是2周。

扣除假日（苏联实行5天工作制，周六起休息），实际访问10天。10天中要来往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大城市，在8个单位访问、会谈，还要参加2个国际性会议，所以日程排得满满的。紧张劳顿倒在其次，遗憾的是，只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难能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深层次的问题。原在国内准备好的本专业学术报告，由于时间与形势，都显得多余了。

说是17号晚上10时半到达莫斯科，实际上等到在宾馆安顿下来洗去一周来的颠簸劳顿，已是18号的凌晨2时了。只草草睡了4个小时，即起来迎接莫斯科的清晨。访苏的第一个议程是参加由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对外友好与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等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学术报告会”。会议就在苏共中央社科院（相当于我国的党中央高级党校）大楼的一个会议室召开。该大楼外表并不怎么讲究，但有气派，门面宽阔，内部装饰极为讲究。底层大厅塑有列宁巨像。我们步入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据说由院长亚诺夫斯基致开幕词，主席台上有苏中友协主席齐赫文斯基和第一副主席、苏科院远东所所长、全苏汉学家学会主席基塔连科。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苏星教授等3人代表团与会，苏星教授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在预先留好的位置上就座。我的邻座是新华社驻苏高级记者，对座似乎也是自家人。会议室呈正方形，会议席呈马蹄形，讲台设在左上角，斜对议席。会上有10多位老年学者发言，一致肯定并赞扬了我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并赞赏了正在进行着的改革开放事业，重温了苏中之间的战斗友谊。有的历史学家还对我党早期活动（包括孙中山时期的国共合作）进行了微观的考证与研究。会议桌上装有意译风，通过耳塞机，可选听英、俄、中三种语

言。但汉语翻译实在太蹩脚，哼哼哈哈，语无伦次，词不达意，速度又跟不上，已经讲到另一段话题了，它还在翻译上一段话题，我只好穿插着收听。

会议分上下午进行，苏联人一天作息大致如此：10时上班至14时，午餐连午休1小时，15至19时为下午上班。会议开到12时有一刻钟休息，我们同基塔连科等几位著名汉学家见了面，并趁机同新华社记者聊起苏国内的政治形势，那时正值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和联盟条约（草案）讨论，他预计叶利钦会当选，联盟条约会通过。

会议继续进行时，对座的苏联朋友示意我们自己动手喝饮料，这时我才注意，隔2个位置即放有4瓶透明饮料，由于下榻处难喝到开水，我确实渴了，边点头表示谢意，边拿起瓶子就喝，但喝了一口就感到味道不对，就像是我们中暑时喝的十滴水的味道，难过极了。事后才知道苏联的汽水就这味。街道两旁自动售货亭的汽水也这味。我百思不解：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能把载人宇宙飞船送上天，为何不图改进一下这个小小的汽水味道呢？

午餐时，我们作为嘉宾被陪同潘佐夫带入食堂。这是苏共社科院主席团成员的专用餐厅，自己不必动手，由服务员端上来，桌上已放有刀叉餐具和切片面包。我们点了3菜后，服务员立即端上来。分食制，每人一份，当然各人可点不同的菜。第一次开洋荤，我们格外小心谨慎，尽量文明些，不使刀叉碰出声响、不大声咀嚼食物、不高声交谈。菜盘小、数量也少，无非是些生切卷心菜末、番茄切片、鸡蛋和牛肉片，原先点的苏联鱼已没有了。端上来一盘汤米，即大米、肉末汤。中国人爱喝汤当然就吃上了，但由于是羊肉米汤，我喝了一口就丢下

了。唯有切片面包是放在一起大家吃的，有灰色（即平常讲的黑面包）和黄色的，前者较富营养、易消化，后者吃口较好。点来了苏联的名贵菜——鱼子酱，但一尝味道也不过如此。吃完了一结帐，6个人共24卢布，人均4卢布（在苏联人看来就是4元钱，在我们看来等于8角人民币），太便宜了。陪同告诉我们，这是特殊餐厅，特别优惠，市面上大约每人要15个卢布，隔壁餐厅也要10卢布。我们步出餐厅时，看到隔壁门口写着：“高级科研人员专用餐厅”，并标有营业时间、就餐价格。楼下则是科学院一般人员餐厅。可见等级观念何等严重！

午休时我们沿着楼梯、过道，看了休息室、办公室、阶梯教室，感到这个装有上蜡地板与护墙板、铺满红地毯的大楼的确气派不凡。或许由于森林资源丰富，内部材料多为木材。临出门时，我们特地在大厅列宁塑像前摄影留念。

次日（19日）我们又应邀参加由苏科院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第3次国际研讨会”，地点在莫斯科的苏维埃大礼堂。我们的团长被邀在主席台后排就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莫菲也夫在会上讲了话，来自各国的有关专家学者计15位在会上发了言。发言是限时的，20分钟。有2位来不及讲完的，在全部发言结束后，因还有时间多，执行主席特许他们再作一次申述，因为有趣的是，他们在第一次发言中就有不同的见解。为了解决语言障碍，进入会场前，在门口凭请柬领取有关资料和微型意译风，但只有外语而没有汉语。我粗略统计一下，与会者约有400人。

苏维埃大礼堂是一座古朴、庄重、厚实的古老建筑，底座用大块花岗岩砌成，外墙面像上海外滩的大楼。会议厅在上层，需拾级而上。两边厢房有休息室、大小会议室、陈列室等。

我因打电话与留学生联系事趁机跑遍了这些房间，房里装饰陈设都很考究，且古色古香，颇有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特色。

这天午餐我们乘大客车到苏科院食堂用餐。院内有两幢高达20多层的大楼，这是莫斯科少见的。因为一般建筑大多在4至8层之间，10层左右或以上的就不多见了。食堂大约在2楼，只见室内餐厅和厨房都非常洁净，用膳者几乎毫无声息地进入餐厅，自动地排队、拿盘子、取餐具，隔着玻璃逐一向服务员点着里面的样品菜，一路过去，几个窗口买下来，盘子上已摆满了，加上饮料，几乎放不下了，我这才端着盘子走到桌边坐下。鉴于大多为冷餐，我们都以热咖啡为饮料，并有意回避了价昂味不美的鱼子酱。我发现，除了咖啡，中国茶也是食堂里的热饮。此外，就是果子露了。这一餐，东西虽比不上昨天的，但花色多、价钱便宜，才6卢布。

从会议书面材料得知，为期2天的国际研讨会第一天是学术报告，第二天是分组研讨。我们5人分别被编入各国学者混合编成的小组。这是一个很好的与各国学者结识、交流的机会，但可惜的是，由于行程关系，来不及道别，我们就于当天晚上离开莫斯科赴列宁格勒了。

六、在列宁格勒的学术访问

为节省钱，我们来往于三大城市之间均乘火车。为节约时间，乘的是夜间车。在苏境内的行程，包括接送、住宿、观光、访问等，一概由苏方负责。但他们不像我们设一个全程陪同，而是分段陪同。这两天的莫斯科活动就是由潘佐夫负责的，一旦登上火车，他的任务也就告一段落了。潘佐夫是个30多岁的

男子汉，身材魁梧，手脚毛长，会讲不太流利的中国话，主攻中共党史，出过有关的书籍，在山东省社科院进修过，到过中国的一些城市。这两天大家相处得很好，有许多共同语言，除了赴会，他还带我们上莫斯科大学景区和名闻世界的红场参观游览，还特地带我们路过戈尔巴乔夫居住的别墅，特别是我们到达莫斯科那天，他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10时半才等到了我们，更使我们感动。我们送给他妻子一方丝巾、11岁女孩的一块玩具电子表，也给了他本人一件小礼品，聊表心意，第2天他来接我们时，喜形于色，说是妻子与小孩如何如何地高兴。……不料，我们离开莫斯科那晚却遇到了使我们双方都很尴尬的麻烦。一是我们离开宾馆前，他违诺来迟了，为行前行李寄放事与服务员没有及时接洽好，双方都很呆板，不能通融，害得我们只得悻悻然全部带着走；二是我们登上汽车直奔火车站时，大家的护照都未拿到手，而没有护照是寸步难行的，如果为了取护照而误了点，将影响整个访问日程表。他急得团团转，奔走得满头大汗，护照也终于拿到了，可当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跑到车上时，离开车时间只差二分钟了，真是急死人！为此我们还走散了一位同志，后来总算在列车启动后找到了。事后我们大家也很谅解他，原本是个做学问的高级科研人员，怎能精通公关呢？

首先访问的是苏科院东方研究所。该所主攻远东和中近东文化，与东方各国特别是我国关系甚为密切，所长不久前曾来我院访问过，对我方非常友好，但可惜的是那天他在莫斯科有会议，不能来接待，由一位会汉语、后脑勺扎有一条短辮的青年科研人员接待。此人很有意思，穿着朴素，谈吐直率，汉语半生不熟，年纪不大，但很老成，专攻满族文化。他把该所五

种层次的科研人员职别说成是实习工作人员、小研究员、研究员、大研究员、领导研究员。该所工作制度并不很严格，有的在家工作，有的在单位工作，每周二上午都得来上班。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其中包括对中国法的研究。包括一位副所长和一位室主任等几个人专门研究中国唐代的婚姻法、西夏法律（已出版《西夏法》一书）、汉代法律、近代法律、女贞近代法，当然也研究日本法。由于我瞥见身旁一张写字台上放有我国的《唐律疏议》一书，他就指指手说：

“呶，雷巴科夫就是研究、翻译《唐律疏议》的”，然后又嫣然一笑：“但是还未出版，一共有6,000页，每年只完成几百页”。接着他介绍了自己对满族文化的研究成果。

我扫视了一下房间，办公条件跟我们不相上下，人多桌子挤，加上书橱，行走不顶方便，在家研究的桌子上较干净，在办公室搞研究的桌子上书籍堆积。写字台也较陈旧。墙上挂有汉字条幅，桌上压有东方文化的印刷品，颇有东方文化气氛。我们又浏览了走廊上的陈列橱，嗨，真了不起，每一个玻璃橱陈列着每一年该所出版的成果。我细细地点算一下，从1982年到1991年上半年一共10只橱，每橱（即每年）平均24本书左右，一个月2本书。根据书名，课题大多为古、近代。离别前，在走廊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会讲几句汉语，访问过中国，很热情，可惜未及细谈就握别了。

如果说访问东方所是一种淡淡的青灰色的话，那么访问苏科学院列宁格勒图书馆的气氛就是浓烈的热情了。该馆自1716年建立以来已有275年的历史了。原先图书馆设在沙皇的宫殿里，后来才迁至涅瓦河滨的此地。后来苏科学院虽然搬往莫斯科了，但图书馆未搬，中心图书馆藏书1,200万册，加上36个研究所

的图书馆700万册共1,900万册。登上馆楼门厅，正中置有老馆长卡而·马克西莫维奇·倍尔（于1835~1862年在此任职）的石膏头像，他专攻分类学，对图书分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先由一位室主任陪同我们参观中心阅览室与一些书库，后由馆长和3位室主任同我们座谈。同我们中国情况相似，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是阴盛阳衰。他们4人中，除了馆长均为女性。他们不久前曾到北京举办过苏科院图书展，对中国的印象好极了。馆长说：过去同北京建立了联系，现在要同上海建立联系，然后再扩及其他地方，因此很想同我院建立图书联系工作。他建议双方互开书展、互派人员（包括工作访问与学者研究）。他也叹了口气：国内政局动荡，人们关注改革，对图书事业不够关心，因此书多而库房紧，已呈饱和状态。管理基本上还处于手工阶段，由于经费问题，电脑很少，刚起步。从参观中看到，他们的阅览室普遍较小，像一间教室，一人一桌，可同时提供阅读、写作、查检。

他们同国外的有关图书馆建立了图书交换联系，其中中国有25个单位。每年进口图书数万册。他们完整地藏有该院成立以来本系统出版的图书63万册，并集中一处检索。还藏有俄国稀有古本书27.5万册。室主任捧出一本17世纪印行的俄国第一本书，木头封皮的书面，内容是关于俄文和希腊文字等，长几百页，拿在手上，份量很重。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亚非文化室”。墙上挂有大篇幅的孔子论语摘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藏书量24万册（包括杂志）。最多的是日文书刊，将近一半，其次为中文书刊。我仔细地浏览了中文书刊，期刊有“中国书目”、“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文物”、“考古”、“浙大

学报”以及中科院自然科学方面杂志；图书有经史子集四部丛书、25史、宋会要辑稿、辞通、大百科全书各卷及一些辞书等，共4万种（书有2万册）。在这个室的各个房间随处可见墙上挂的仕女画和条幅。

七、在莫斯科的学术访问

在莫斯科我们访问了三个研究所。首先访问了苏科院的远东所。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远东特别是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人员多达250名。所长就是著名的汉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基塔连科博士。由于他们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学术与人员联系，故对我们的来访，表示出极大的热忱，着实使我们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所长、阿拉斯诺夫副所长、果多斯尼科夫教授、接待部长（外事处长）斯捷拉诺娃等5人与我们会谈，气氛友好而随和。步入会议室，可以一眼瞥见正面墙上挂的是列宁像，我一下子感到又到了“列宁故乡”，情感上亲近了一层，似乎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一上来就对上海的浦东开发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开发浦东与建设深圳特区的异同等问题联环炮似地提出了询问。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他们接着介绍了该所的有关情况。据称，他们科研所的体制也在进行改革，正在筹建一个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特别是关于同南朝鲜、日本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就像当年研究中苏关系为苏联当局提供战略决策咨询一样。

另有一个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部正在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如何以法律保护改革问题。这方面

已出了许多小册子，如所编的“中国法律手册”就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现正着手编辑一本中国经济改革的文集。此外还研究中国开放改革的法律依据，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还有一个民族和语言文学研究部，已出版了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系列小册子6本，据说是中国国外首次出版的这类书籍，还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百科辞典。

此外，他们还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文化教育、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经济改革经验）、现代化道路、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作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人口问题）、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等。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除了编有中国年鉴、日本年鉴外，竟还办有一份《气功》杂志。

在科研工作制度方面，他们规定科研人员3天来所，3天在家、非科研人员实行坐班制，这与我国大致相似。每年的科研成果均由考核委员会进行考核。职称上分5个层次：初级研究员、研究员、高级研究员（不管有否学位，这3级均得工作3年以上）、主任研究员（没有博士学位）、总研究员。这要比东方所那位讲得更妥贴了。科研人员的最低工资不低于200卢布，人均350卢布。

第2个访问目标便是我所要重点访问的对口所——国家和法律研究所了。在苏联，不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在一院，而且国家学和法律学也同在一所。6月25日那天下午，斯捷潘诺维奇副所长和一位经济法教授同我们进行了座谈。副所长说因为还有一个重要活动等他去参加，故只能简单地讲几句，然后由教授主讲。我趁他还在，急忙提出7个问题请他作答：①

为什么把分属不同分支学科的国家理论和法学理论作为一个所的研究对象？②是否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法学？如何评价其地位与作用？③对维辛斯基法学理论作何评价？④全苏已制订多少法律？⑤目前社会治安状况如何？⑥国内法律意识状况如何？⑦请预测同上海法学所建立学术联系的前景。

对于前3个问题，他回答得比较含糊，或者说未作正面回答。对第4个问题的回答是：“全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至今已颁布了多少法律，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最高苏维埃每年约有170至180部法律等待通过，而实际上只有50件法律获得通过”。至于治安状况，他说犯罪率大大地上升了，治安问题更趋严重了，但这与制度无关，而与过渡时期（即目前的转轨时期）有关系。诸如走私、盗窃、抢劫、杀人、吸毒、卖淫等案件均有发生。这使我想起我们赶乘火车到列宁格勒那天晚上，中科院大连某研究所有一位教授本当与我们同车前往访问，结果因在宾馆卧室里被人偷去一只手提箱（内有护照、现金、照相机等）而不能成行。谈到法律意识，他说，苏联还远非法治国，老百姓对法律与国家都缺乏信任感。处于改革的过渡时期，法律多而复杂，但实效不好，尚需5至10年才能走上正轨。法律的量宁可少点，但质量要好点。

副所长走后，那位经济法教授谈到了苏联目前经济与法的状况。他说，现在商店的东西开始多起来了，这是因为4月2日起物价大幅度上涨、购买力下降的缘故。如他偕女儿到饭店吃一顿饭要30个卢布，够吓人的。谈到法，他说通过的所有制法还比较好，还有银行法、保险法等，均是将来实行的问题，法律体系肯定要过渡到新的轨道去。有法当然好，但究竟如何实行呢？将来企业出让给谁呢？代替一个阶级必定是另一个阶

级，这个问题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他说俄罗斯联邦急切要有2个法：非国有化法和私有制法。这肯定要使经济转到另一种制度上去，部分人将变为资本家。所以昨天利加乔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说，大型企业不应卖给私人，小企业（如理发店、小吃店等）可私有化，否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但大部分人民不想要资本主义，这是可以肯定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但也不是都搞得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得好的。很多学者说，改革时期是痛苦的，要有30至50年时间，一代人的时间。变是肯定的，但向哪里变现在还难说。现在这个转折时期同十月革命时期一样地重要。

六月廿六日大家往访科技情报研究所，我因另有任务而未去。据回来的同志们讲，该所规模大、人员多、条件好、有气派、资料齐全、手段先进，研究广泛而深入。我只有遗憾了。

八、在乌克兰的访问

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乌克兰首府基辅。次日下午访问了乌克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些天来我一直留意人们对列宁与斯大林的态度，对前者人们肯定的多，对后者普遍持否定态度。我在该所会议室里看到墙上也挂有列宁像。科学院通讯院士瓦连京·米海伊洛维奇在正式会晤前对我们说，今天苏维埃正在讨论联盟条约，有反对的、有赞成的，还有集会游行（我们从火车站驱车前往旅馆时看见游行队伍正在广场集中）。有许多人认为不应签署此约，但戈氏打算本月底要完成签约，已有一些共和国决定签约，恐怕乌克兰也难以拒签。

根据副所长的介绍，该所有300多人，是院内最大的经济

所。副院长兼所长鲁基诺夫知名度很高，曾2次访华，中国学者也多次访问该所。所中有人当了最高苏维埃代表与乌克兰苏维埃代表，也有人进入行政部门当了部长（如所有制和私人企业部）。科学院正分解或新设一些小院，但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难题，科研人员正与经济部门合作，争取赞助。

谈到当前苏联经济状况时，副所长非常直率地说：现在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关系不协调，资源丰富与商品短缺并存，比如钢产量多而钢材少，木头多而纸张少，石油多而车子开不动。物价飞涨对经济发展无任何好处，财政赤字很大，人民手中有钱而买不到东西，政府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多而且多变，但都不起作用，提高税收反而破坏了生产，提价削弱了消费，影响了生产。

谈到中苏两国的改革状况时，他们的看法几乎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有成绩的，方向对头。外汇比价、农业都搞得很好。当然也有问题，如经济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但毕竟是前进了，取得了成果。一位女研究员说：而苏联的改革讲得多、做得少，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理论脱离了实际（副所长插语：现在难道不是实践脱离理论吗？）。经济史学家卡拉连柯说：苏联农民大多已转为工人，无人种田，缺少中国农业改革那样的条件。

谈到乌克兰同全苏的比较时，他们说，乌国经济同全苏经济无多大区别，但效率要比全苏高。比如：重工业发达；土地仅占全苏3%，但农产品占1/4以上；糖产量占全苏一半多，但供应全苏，自己要吃也要凭票买。为了自我保护，乌国已发购货券，7月1日起用盖有乌国印的卢布购货。

当我们询问对未来经济的展望时，他们说：这将取决于是

否进行经济改革及其速度。至于多少时间才能好转，他们看法不一，发生了争论，幅度在2至5年间。条件是：政治要稳定，经济政策好。但对农业能否搞好持悲观态度。白俄罗斯已有了土地法，他们没有；所有制法虽已通过，但未实行；不久又要通过非国有化法，这许多法是互相矛盾的，无法执行，没有权威。

六月廿八日上午我们访问了外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这是我们访问中气氛最为热烈、充满苏中人民深情厚谊的一次学术访问。一进入会议室，即见长方形桌子上已插好苏、中、乌三国国旗，气氛隆重。所长告诉我们，这是乌国第一个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所，是1975年在历史所与经济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8个研究室，已接待过几批中国学者来访。他去年来过中国，途经北京、上海等地。该所的科研是结合乌克兰实际进行的。这两天在乌国苏维埃大会上开展了关于联盟条约的辩论，各种意见都有，所内也在议论，看来联盟条约还是要签的。

一位室主任在介绍研究课题时说：他们着重研究中国同其西部邻国的关系及其政策，中国对中近东与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也研究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构成，宗教的分化组合问题，政教关系；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包括四小龙）崛起的根据（如何中近东无四小龙现象）。

在几位室主任和所长的谈话中，一个共同的充满诚挚的话题是对乌中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的追溯。有的说：早在17世纪乌国建立过程中就有2个中国团队来支援过。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帮助了我们。20年代曾派军队来乌。乌也组团支援了中国革命，现仍保有孙中山时期的许多文件。今天讲这些并非单

纯为了回顾历史，而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合作。有的说：中国对远东的政策很值得他们借鉴，因为他们正在研究乌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参加欧洲国家行动问题，还研究乌的侨民问题（有几百万），犹如中国的华侨。所长插话说：要学习中国的华侨政策，更多地接触乌侨。

一位室主任说：他的前辈在哈尔滨住过，他了解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早在1959年他就出版过一本书，讲中国同美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高兴的是中美70年代建交了。60年代时他还参与百科全书的编写，写过中国革命战争、邓小平、叶剑英等条目。

另一位室主任说：早在20年代，在哈尔科夫就成立了“中国公社”，专研中国问题，还开办汉语学习班，这是最早研究中国的组织。布申科等人还专门学了中文、日文。布鲁斯基教授至今仍在研究中国历史。

所长告诉我们：未到中国时已看了些有关中国的书，到了中国却感到现实同书上写的是两码事，特别是对10年来的政策印象尤深，不仅解决了温饱，且给人民带来了实惠，说明政策是正确的。

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乌克兰还有一所1950年就开办的汉语学校呢。地点就在研究所所在的区内。该校专供少年儿童学习汉语，从小培养汉学家及其接班人，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这个学校也没有关门。现有学生300至400人。它直接同中国哈尔滨第七中学建立了交换教师的双边关系，每2年换一批，每批3个人。我真想亲自去参观、采访一次，但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如愿，遗憾良久。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东方语言研究所。所长会一些中国

话，但基本上由北师大研究生小王同志当翻译。小王是位很活跃的女同志，原拟在苏住一年，完成其毕业论文，但其实几个月时间即可完成，现主要任务是教所长们汉语，她不想多呆，要提前返国工作。

所长说：他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这是由来已久的事。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便是乌克兰人，大约在1906至1907年。十月革命至20年代就有中国志愿军参加他们的国内战争，同时也有许多乌克兰人参加了中国革命。这一段历史是非常珍贵的。2个星期前他还到过中国，许多人托他到中国寻找50年代的朋友。所以他是很珍惜中苏传统友谊的，特地在武汉拜谒了苏军抗日飞行员纪念碑。

他告诉我们：乌克兰语言学院20年代起即研究汉语，专设汉学所，现称东方学所，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乌中经贸，也研究东方国家（包括土耳其、印度等），对中国主要研究现代史。但1935年研究所解散，许多人转行到了莫斯科等地。80年代开始受到国家重视，但从零开始，起步维艰，故请小王帮助培养汉语干部。全所现仅14人，计划编制是140多人。本所同莫斯科的远东所之间互在对方设了分部。所长自信地说，不管当前苏联局势变化有多大，东方学的研究前景看好。

九、风物景观

地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广袤的土地孕育着丰富的资源，山川、森林、湖泊、草原，应有尽有。自莫斯科大公国以来，由于历代俄罗斯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建设，加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成立、15个加盟共和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苏联境内，

随处可见美丽的自然风光，庄重典雅而颇具艺术特色的历代建筑……

（一）心往神驰的红场

不论来自何国，也不论具有何种意识形态，到了苏联总要一睹红场与克里姆林宫的雄姿丰采。

地处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名声虽然远播全世界，其实占地面积并不大，约模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1/3或1/4，并不比上海原来的人民广场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由于在这里矗立着最有名、最典型的教堂与钟楼，更由于列宁陵寝的存在，苏联政治核心所在地克里姆林宫的存在，以及每年“五一”、

“十一、七”在红场上的三大集会与阅兵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现在，只要付2个卢布，就可以随机跟着旅行社在广场边组织的集体参观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当然，在领导集团办公的地方，有专门的进出车道，门外有警卫守护，红场上站有警察，每过一些时间，你就可以看见一辆辆轿车一溜烟地进去或出来，这里是禁止参观的。我们站在广场当中，环顾四周的建筑物，主要是克里姆林宫、红墙、红场、伊凡大帝钟楼和圣母升天教堂等一大批毗连建筑群。红场的南端是瓦西里布拉仁教堂，9座屋顶像洋葱头的钟楼式东正教堂——这种建筑我曾在上海的襄阳南路、长乐路口看到过，8小1大，对你围着。红场的东面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公司，人称“古姆”（俄语三个单词的司头字母读音），是一幢双室长廊连环式的三层百货商场。红场的西面就是有名的列宁陵寝了。墓在红墙正中处下部，上部更是两大节日里领导人检阅处。墓门口两侧，笔挺地站着两名持枪战士，英俊威武，手上都戴着白手

套，每隔一小时换岗一次，仪式相当庄严凝重。人们可以排着长队等候入内瞻仰列宁的遗容。墓后侧红墙下葬有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树有大理石墓碑，碑上刻有姓名和生卒年月，其中12个碑上刻有半身像：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日丹诺夫、伏龙芝、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柯西金、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苏斯洛夫。红场的北面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花园，园内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纪念在1941至1945年间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军战士。设计很奇特：平放着一大整块长方形的深红色大理石，右前方置有石雕的军旗与钢盔（均为平放），大理石前面有一座长方形墓穴，用大理石封盖，中间刻有一颗五角星，中央终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炬。碑后松柏常青，碑前花圈常新，一批批的参观凭吊者，大多为中小学生们，由带队老师讲解，也有举家来凭吊的。沿着花园里的通道走去，还可见到旧莫斯科剧院的遗迹，旁边竖有根据列宁提议建立的纪念碑，碑上刻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拉萨尔、倍倍尔、坎培拉、还有圣西门、傅利叶、若列士、普鲁东、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政治名人。

红墙、红场之所以红，固然有着建筑色彩上的红颜之故，但更主要的是：一因红象征着革命的热烈与热血；二因十月革命以来确实是“红日照遍了东方”，无怪乎当年瞿秋白称莫斯科为“赤都”。眼看近几年来苏联局势的剧变，我们不无感叹地、留恋地边看边退出了这红色的区域。

（二）列宁山上的最高学府

莫斯科大学是苏联最高最大的学府，也是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它原是以罗蒙诺索夫命名的古老而权威的名牌大学。

无奈我们科学院系统与教育系统无直接关系，又值期终考试与放假之时，故而苏方将它从我们拟定的访问对象名单中一笔勾去了。但我们不死心，在陪同的带领下，几经转车，来到了位于列宁山上（其实是一座很低坡度的小山）的莫斯科大学区。主楼是一座传统宫殿塔尖式的建筑，犹如上海的工业展览馆（旧称中苏友好大厦）。大马路前面是一个面积颇大的花园，再前面就是可以隔着拦墙俯看莫斯科河的景点了。站在此地，仿佛站在上海外滩看黄浦江。低头看，莫斯科河象一条白色练带，蜿蜒而过，时而有一艘乳白色的游艇缓缓而驶。越过河，对面是一座圆形的建筑物，这是列宁体育场。抬眼往右望去，是一座铁桥，犹如上海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这里地势开阔，居高临下，是一个摄影、观光的好景点。因此不断有旅游车停下来，出来一批批外国旅游者，苏联游客也不少，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大批集体参观的苏军战士或陆军学校的学员。尽管我们在这里留下了身影，我还赶到大学主楼前面抢拍了一个景头，但未能真正进入校园，的确是莫大的遗憾。

（三）彼得堡要塞的遗迹

列宁格勒的前称是彼得格勒（1914~1922年），原名为圣·彼得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苏联国内讨论改名的当头，据说戈尔巴乔夫表态，还是先别讨论改名问题，以免引起一系列命名的连锁反应。到了列宁格勒都想去看看当年十月革命的指挥所与战场：斯莫尔尼宫、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等。但由于时间不允许，有的只能路过时隔着汽车玻璃看，有的在涅瓦河大桥上远眺。根据接待单位的安排，女导游将我们带到了“彼得堡要塞”参观。

这是由彼得大帝于1703年建立起来的城堡。1727年才开始出名。要塞在后来的对外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涅瓦河中的小岛。其实，这是一个“大世界”。里面有彼得大帝的雕像，广场前方原是行刑场。还有指挥部、建筑师房（沙皇专门从西班牙请来）及其后裔的坟、武器库，还有一座“死亡之宫”（宣判死刑处，沙皇遗体存放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件”，一是教堂。照那时的规矩，凡作为首都必须有教堂，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堡后，此地大建教堂，有“教堂之都”之称。彼得大帝建立的彼得教堂，连顶有122.5米高，成为沙皇家族进行宗教仪式之处。二是棺槨。要塞内有一处专门陈列彼得大帝棺材及其陵墓内的陈列物。进入室内，简直就是棺材窟。有一处是6只棺材，均为大理石，是大帝及其后裔的，西班牙建筑师的；另一处是5棺，再一处是7棺。大帝的陵寝有一座木雕金漆门，上下左右皆有画，金碧辉煌。三是监狱。要塞内的监房专门监禁政治犯，里面灰暗黑洞洞，每间小房内有一单人小铁床、一单人小木桌，桌上有一盏小油灯。列宁、高尔基等名人都在这里被关押过。

（四）一座大花园

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一座花园，这就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花园。车子从我们的住宿地——濒临波罗的海的勃利巴金斯基宾馆出发，长驱24公里才到了这里。这里附近本身就是一个布满大小小木结构或砖墙式的别墅群，间隔着许多大小花园。而进入上述这个大花园，我简直惊呆了，好像上海的西郊公园，一个一个景点地走过去，当中还有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每到一处，都有一座花坛，围着当中的一座雕塑人

身像，其中包括花园主人夫妇的雕像。里面也有纪念卫国战争的纪念雕塑。还有两三处专门供游人参观的小展览厅，房内置有风俗性油画或民间小摆式、小玩具、小土特工艺品。就在这里，我遇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后，我与他们分别合影留念，也给小孩一点点小礼物，家长也很乐意地同我们接触。只可惜，因为相机不慎摔坏了，好些照片曝了光，其中就包括这几张照片，实在太可惜了。

（五）迷人的夏宫

最令人感叹的还是列宁格勒的“夏宫”。择其要者，有二大特色：一为宫廷装饰，一为园内喷泉（故又称喷泉之宫）。我们赶到夏宫时，售票处门外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据估计要2个小时等候。导游小组很是机灵，我在排队时，她已打通了宫内办公室有关人员的关系，凭其一张字条，我跟着她前前后后跑了起来，虽然也费了些劲，但总算较容易地买到了两种票：参观宫廷内幕的票和公园的票。

我们先参观宫廷。这是一座长方形建筑的两层楼房。上楼前，先在底楼寄放包裹与照相机（其实有些人还是带照机上楼拍照），换上包脚鞋，然后人人蹑手蹑脚地上楼参观。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个房间金碧辉煌，犹如一个个典雅豪华的精品展厅。每到一室，我都记下一笔特征，共有20个大小房厅。第一间是沙皇接见外国使者前，负责接待的大臣会见贵宾处。写字台上还有当年的书、蜡烛灯、羽毛笔，墙上挂有4幅油画，墙角有座中国瓷器粘搭成的落地宫殿工艺品，形状有点像北京的前门。第二室是纪念厅，专门纪念历次海战，因彼得大帝特别重视海军。不但四壁都是油画，连天花板顶上

都是特大的油画。第三室则专门陈列皇室人物油画，还摆有一架钢琴、皇座及其接客处。第四室的特点是，除了天面大油画，四周全是镀金雕饰的小天使。第五室是餐厅，长方形餐桌上满是精美的餐具。第六室全是中国瓷器、红木座椅，是国宝置放处。第七室是人物油画室，四周墙上全是皇室人物的半身特写油画，并间以雕饰。第八室是中国式房具。第九室是琴房，置有竖琴，用皇后喜爱的中国绸布装饰墙面，还有放置各种式样中国扇的橱。第十室是寝室，墙上有中国画。第十一室是盥洗室。第十二室是贵宾起居室。第十三室是标准起居室。第十四室是侍卫长起居室。第十五至十七室均为中国“瓷宫”。第十八室正在装修。第十九室是当年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卧室。第廿室是书房，台子上有金属地球仪，书桌上连有书橱。

走出二楼宫廷展览室，我一方面为沙皇的奢侈而惊叹，另一方面又为俄罗斯人民的创造所折服。劳动者的辛勤创造为剥削者所享受，这是任何剥削制社会的必然现象。

接着，我们在偌大的皇宫花园里流连忘返。夏宫花园里的花坛与喷泉之多，堪称世上少见。而且处处喷泉各显特色，喷头的多寡、大小、高低、斜直、组合、花样各不相同，还有一处喷泉树。国内游人如织，相机嚓嚓有声。我们贪婪地观赏，留恋地出了园。

（六）基辅的教堂

在基辅，我们忙里偷闲看了两处地方：安得烈耶夫大教堂的珍宝馆和索菲亚大教堂。前者是在两处学术访问结束后由对方陪同人员通路子，抢在傍晚关门前去参观的。我们去时，已

经没有一个游客了，工作人员专门为我们开放展厅。尽管讲解员非常卖力，讲解详情，但由于我们对那些老古董——从古币到金皇冠缺乏鉴赏力，提不起多大兴趣，只是“外行看热闹”，啧啧称赞这些珍贵的国宝；同时也由于那些认真的工作人员专门为我们而推迟下班（有的甚至收拾好手提包在等待我们离开），我们感到过意不去，于是就匆匆地浏览一下，打道回府了。说实在，如果是“内行看门道”的话，那么一天也看不完。

看得较仔细的还是索菲亚大教堂。那是一座11世纪建立的，作为皇族礼拜堂的建筑群，历40年而建成。后遭战乱而毁坏，18世纪又重建。几百年间几经损坏又几度修建，外形屡有变化而内部基本未变。为免“身在其中，不知其貌”，我们先看了教堂建筑的模型。共有13个圆形金属堡顶，门墙均有画。最近修建的是一种巴罗欧风格，特点是白墙、金顶或灰顶，大圆顶的有11只，时当乌克兰最为繁荣时，现共有19个大小尖圆顶。

在主教堂中，讲解员告诉我们：圣像墙是18世纪新添的。地板11世纪原为白色石头泥土，18世纪改用陶瓷，现用铁铸，但也保留一片破旧的地板。顶墙、边墙均有画像。虽没有画十字架，但顶部、空间和地面的形状看起来就象十字架。最高处离地29米，有二层楼，当时的工匠是用特殊方法把建筑材料运上去的，现墙上仍留有洞迹。

教堂的这种建筑风格在乌克兰是独一无二的，即使现代建筑也是无法与其相比的。现建筑保持了古建筑与古画的风格，如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察觉的，墙面上的画全是用碎石子和碎玻璃拼成彩色的，既不退色，又不会风蚀时损，共用了270立方

米碎玻璃。抬头望圆形顶部，有5幅画，当中1幅、周围4幅；圆拱形墙面上共有12幅画，正面当是圣玛丽亚的像。当然有些画剥落了，后人再用油画补上去。原先的画是用碎石粉和植物汁搅和起来染上去的。可惜的是，由于流光的影响，这些珍贵的古画未能全部留传下来，后来只得补画其它。

当时此处有全俄第一个图书馆（有藏书900册）和第一个学校，宗教文化还影响到欧洲。此地的主人名为雅罗斯拉夫·牟特利——松泽（太阳之意）（978~1054年），是教堂的奠基人，共有11个子女，后多与欧洲联姻。教堂中原放有许多棺材，现仅留下一只，材上有十字形，棺盖头上为山字形尖顶，下为长方体。到了18世纪，此地易为修道院。

十、世象种种

（一）衣食住行

外国人的社会生活仪态万千，还是先从苏联人的衣食住行谈起吧。

从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一跃而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便是城乡差别的缩小。从赫鲁晓夫的“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到勃烈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看来未免缺乏一点自知之明，但毕竟是历经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从衣着上看，不论在我们国际列车的沿途大小站头，还是在三大城市的来往过程中，基本上分不出“这是城里人，那是乡下人”。穿着普遍较为整齐洁净，不象我们发展中国家那样，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的衣着打扮是那

样的泾渭分明。虽然我国大中城市的郊区农民的衣着已有很大变化,但总体水平仍有明显差别。在苏联,只是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才可能察觉穿着装束上的民族特性差别,城乡差别不大明显。后来才知道,农民阶级已基本不存在了,因为老一辈农民早成为林业工人或成为退休金领取者,年青一代也大多流入城市当工人,务农者极少,且生活日趋城市化。

如果把我国目前城镇居民的衣着分为上中下三级的话,那么目前苏联人的衣着一般在中或中上之列。不论男女老少均较为整齐清洁,女士们当然更花俏些,但式样、格调似乎没有我们这样丰富多采,特别是女士们的衣着尚不及我们这样花俏、新艳。与此相伴的打扮与随身包袋方面,一般女性大多搽粉抹口红,但大多赤脚着鞋,穿长统丝袜或健身裤袜的少见。鞋子与随身包袋的花样与色彩均不如我们,较为单调、陈旧、粗糙。因此我们每过一处,总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甚至还有人向我们提出购买我们脚上穿的皮鞋或旅游鞋、身上背的包袋的要求,我们当然婉言谢绝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使我们纳闷:女士们大多呈肥胖型,特别是已婚、已有家小、30岁以上者。少女还是非常漂亮、可爱的。问其原因,据说主要因为苏联地处寒带,冬长夏短,女士们呆在供有暖气的家里时间太久,吃的又是白脱奶油加面包,所以日积月累就自然发胖了。

对苏联的“食”可就不习惯了。首先是食物单调,蔬菜以土豆、卷心菜、西红柿、黄瓜等四大金刚为主,荤的以牛肉、鸡肉居多。有的食堂里能吃到明太鱼,鸡蛋很多。在我们所呆的那段日子里,吃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外加一些饮料或有限的花式小菜。不象中国食谱那样的丰富多采,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水果也少,似乎蕃茄当水果,只在基辅看见大批草莓上

市,难见其他水果。玻璃大瓶里的水果味道实在不敢恭维,虽然价格低廉。其次是以冷食为基调。加一些奶油、鱼子酱之类的,还是冷的。饮料也是冷的居多。只有咖啡是热的,因此我每餐必喝咖啡,否则胃吃不消,尽管我的胃口在中国也是一只“垃圾箱”,样样吃,从不挑食,但在苏联却“咕噜咕噜”了两次。至于热汤更是喝不到。第三是缺乏调味品。餐桌上仅放一小碟盐,嫌淡就沾点盐得了,什么酱油、醋、辣酱、味精、葱蒜等等一概见不到。难怪中国留学生的烹调技术及其掌勺的菜肴,就成为苏联同学的美味世界了。即或面包,也是大、长、粗、硬、干,远没有我们这里的松软、香甜、轻便、可口。我们有一次各买了一根长棍面包,足有50公分长,和着冷牛奶,足足吃了两天。

“住房难”在苏联基本上不存在。据有人统计,莫斯科居民住房面积已达人均16平方左右,原打算到世纪末要达到人均一套房的理想目标。加上昼夜供应热水,冬有暖气,居住条件确实比我们好多了。尽管他们近年来很少建造高层居民楼,我国城镇在大造公房的同时也出现许多漂亮的私人住房,但由于起点差距大,目前在总体上还不如他们。我每到一处甚至坐在车上都很注意观察他们的阳台,始终未发现有什么晒衣铁架伸出来,内阳台上少见晒衣服的。至于象我们那样把内阳台封闭当房间使用的情况,只偶而发现有几家。居民家中电话、冰箱较为普及,但彩电率比我们低,录像机刚刚起步,收录机远比我们落后,相当于我们80年代初。

最使我羡慕的是他们的“行”,“乘车难”问题已不复存在。这不能不归功于发达的地铁。三大城市均有四通八达的地铁。在莫斯科,地铁车站门楣上标有M(俄语地铁第一个字

母)，从地面到第一层地下站台是100公尺的自动扶梯；再下去100公尺是第二层地铁线。只要花15戈比，在里面转转线路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了。因此，地下城市是非常热闹的。这些地铁分两批于1935年与1946年建成起用（地铁大厅墙上有标志）。走道很宽敞，边墙上都是艺术性很强的雕塑图案，气派很大。据统计，莫城共有9条地铁线路，100多个车站，200多公里长，每日夜运送旅客1000多万人次。平均2至3分钟一趟车，每列8节车厢。我想，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奇迹。后来卫国战争的统帅部据说就设在地铁里，莫城人民借地铁保卫了生命与财产，粉碎了德寇的进攻。战后第2年居然就把第二层地铁造出来，这又是一个奇迹。社会主义苏联在历史上的功绩是谁也无法抹去的。

苏联的国土世界第一，人口不到3亿，行人有一大半到了地下世界，那么地面行人当然更少。加上莫城私人小汽车拥有量已达一定比例（有人统计为每百户家庭有30部，但我观察下来没有这么多），因此乘公共汽车或电车的人就更少了。公交的站头，大站有候车亭，亭内备有木条长凳，闹市区车站设候车亭，站着候车，站牌的式样与标志类同我们过去的老式站牌。车次也没有我们这样频繁，要等候几分钟才来车。但车子毕竟不挤，不用排队，人们都能有秩序地上车，也没有争先恐后抢座位的现象，人们都能让座给老人、小孩和女士。男士们宁可站着，也不去抢位置，即使去坐了，也没有“急吼吼”的样子。车上没有高声喧哗与嘻嘻哈哈，基本上寂静无声，象地铁里一样，有的看书报，有的观窗外，有的闭目养神，即使熟人交谈也是窃窃私语，避免干扰别人或引起别人的注目。

所有公交都是无人售票。乘地铁时，或在售票处窗口换好戈比，或将硬币丢进自动售票机，换好零钱，然后把15戈比丢进入口处的小圆孔，自动栏杆才打开通道让你过去。如果不丢钱币，或者栏杆打不开，或者你跟别人进去时前面一道栏杆又把你关在外面，这时第一道关早已关上，那么你就成了笼子里的怪人了，众目睽睽之下，你将尴尬异常，无地容身。我们特地试验过，多丢钱或少丢钱都过不去。丢这个门洞，从旁边入口处进去也不行。所以我们都预先换好硬币上路，因为有的车站没有换零钱窗口或自动售票机坏了，那就寸步难行了。

至于地面交通，也要在路旁自动售票机里丢进15戈比硬币，然后出来一张车票。如果忘记了买或来不及买，甚至机器里的票卖光了，那也不要紧，只要到车上司机座的隔离玻璃窗口轻轻敲一下，司机会把票撕一行下来，正好一卢布，供你自由使用。如果车子开动了，要等到车到站时才能补买，否则司机不睬你。车上没有售票员，乘客均得自动将票往安装在车把手的轧印机上轧过，如果离得远了还可请就近乘客代劳轧一下，就像上海人的“摆渡”购买车票一样。我还从来未发现有人逃票。如果逃票了，怎么办？据陪同告诉我，偶尔也查票，查到了就重罚。但一般人是绝不会为了区区几个戈比出洋相的。我认为，人们的这些素质不是一个早上就能获得的，而是几十年长期培养起来的好公德、好习惯。

马路上根本看不到自行车，只是在国际列车沿途小站上偶尔看见有人推着或骑着自行车。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大桥头，看见一位少年骑着一部赛车练习，我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喊起来：“自行车”！马路尽是双车道、四车道、六车道甚至八车道的快车道，加上人行道上行人少，马路就显得很宽敞、很通

畅。过马路时，行人一般都能做到走横车道，但并非一切人都能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明明无车通过，人们也会闯过红灯道口走过去的。那里的地下通道很多，有地铁的地下通道，也有地面交叉马路的地下通道。在这些地下通道上，可以看见乞丐，残废者，抱着小孩付钱的吉普赛女郎，拉拉唱唱的街头卖艺人，更多的是个体书报摊。

（二）物价与生活

过去苏联人的生活，应该说是不错的，从工资与物价的比价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来看，生活早就小康了。但由于长期以来农、轻、工、商等发展没有调节好，人民生活存在着种种不便。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不定，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生活。

苏联的物价一向是低廉的，特别是少儿用品。即使是91年4月2日开始的全面提价（幅度在60%至200%之间）在我们看来也还是便宜的。但对照工资的相对停滞增长以及卢布的不断贬值，生活就显得拮据起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苏联职工一般工资在350卢布左右，基本生活物价应该说不贵的，特别是公用事业费。比如：公用电话费一次仅2戈比，邮票一张7戈比，乘车一次15戈比。由于能源资源丰富，水、电、煤气费用更加低廉，分别为1戈比、4戈比、8戈比一度。一张公交月票18元（学生仍为6元）。蔬菜与食品的价格大体如此：每公斤西红柿为8.40卢布，黄瓜2.27~6.00之间，卷心菜0.70，咸肉3.04，牛肉7.00。每瓶奶酪0.78，牛奶0.44~0.90，每杯果汁0.51—0.61，每杯雪碧2.90，面包或饼（只）0.30—0.90，

小蛋糕4.80，中蛋糕8.30，大蛋糕未见。我们到过莫城著名的合资企业“麦克唐纳”快餐店，一小包炸土豆丝2卢布，一大包10卢布，一个汉堡包5卢布。最贵的是鱼子酱，一小罐头40卢布。其它物品的价格是：一件优质上等呢大衣从400~600卢布，一个石英挂钟最低价35卢布，最贵的有工艺镶嵌的400卢布，手表也在35至300卢布之间。嵌宝戒指价在300至1,200卢布之间。最便宜的是国营书店的书籍，1至5卢布。但书摊上均在5至60卢布之间，带有性、情的书画报更贵，至于国外进口的带有性刺激的画报最贵。邮票很便宜，我每到一处，不管宾馆还是小书亭，凡能买到的纪念邮票我都买了一套，从1卢布到20卢布一套。

以上价格对苏联人来说还是贵的，因从未遇到过调整价格，且调幅又如此之大。但由于面包、牛奶等的便宜，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不过，对过惯小康生活的他们来说，日子一下子变得紧梆梆的，怪难过的。而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从美元比价看物价，觉得实在太便宜了，几乎凡能买到的都是便宜的。比如：以5.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1美元换成35个卢布，那么花1美元便可在食堂吃3天，可以买一大堆面包和牛奶呢！1美元还可买一只手表或一个挂钟，可买一只少儿照相机（折叠式，效果还是可以的），用100元人民币代价就可买到一件优质呢大衣。我在基辅宾馆附近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一盒吉林人参蜂皇浆竟售2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40元。

由于经济的拮据，生产的下降，卢布的不断贬值，以1991年的官价汇率（贸易价）算是1.8卢布换算1美元，但非贸易价（旅游价）却是1美元换27卢布，黑市价则是1美元换32至40卢布。这样，在存在国营价与个体价、官方价与黑市价、公

价与议价的多重价格体制下，加上美元兑换价的变化，在缺乏硬通货的苏联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一个月的工资才值10个美元，60元人民币；中国人的工资以250元人民币计算，折成40多个美元，可抵1,300个卢布，这是多么悬殊的对比啊。近闻俄罗斯总统宣布92年开始物价大幅度上涨2至5倍，而工资最多增1倍，那么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可以想象的。

（三）人与城市

苏联的城市是美丽、宽敞的，绿树成荫，绿化成片，街心小广场及名人雕塑很多。在基辅，我沿着宾馆门口大街一直上行，右手马路边盛开着一大片月季花，没有人拗折；再往前走，越过人行道绿化带，竟是一大长条的没有门的公园，舒心极了。

城市的建筑各具特色，公用民居大多在4至8层之间，10多层的建筑物算是高的了，少见有20多层的大厦。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地大人稀，几十年来已取得了大规模建设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几年来少有新建筑项目，因此可以说：老建筑我们比不过他们，新建筑他们比不过我们。

城市里的小汽车是多的，但大多半新旧，数量上我们比不过他们，质量、花式、成色上他们比不过我们。

作为国家的公民，苏联人的个体素质又是如何呢？这也是我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资料称，苏联的文盲率是零（美国的文盲是4.5%至10%），这说明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是很好的。这就使得他们这几年的犯罪率虽然提高了，但毕竟未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步，他们的个人

公共道德水准也比我们高。比如：没有发现街头有起哄、围观现象，争吵、相骂现象，连排队购物也是静悄悄的，看不见插挡与争执，未发现顾客与营业员的争吵，未发现有人随地吐痰或乱丢东西。在自选商店、自助餐厅、自动售货机前，人们都是彬彬有礼，秩序井然。

但看得出，他们自感很窝囊，心里很沉闷，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对电视机一天到晚播送苏维埃大会冗长的发言已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对经济改革感到失望，对政治前途顿觉茫然。因此人们都匆匆地行走，悄悄地行事，缺乏欢乐的气氛，失去豪迈的气概，学者和干部都在为国家前途担忧，居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忙。人人头脑中几乎都打上了问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国家到底怎么了？我们应向何处去？难道过去的一切全都错了？那么将来呢？

由于禁酒令的实施，马路上已少见酗酒后的醉汉，但仍然两次遇到突然瘫倒下来的人。或许由于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吧，在酒店内外，似乎向别人讨香烟吃是不会脸红的。

有几种社会现象是反差强烈的。比如：海陆空交通很发达，列宁格勒仅客运火车站就有6个（按路线分建）。但邮路却非常缓慢。据说莫斯科市内一张明信片要走几天，一封寄往国外的信，可能后来人已到家，而信仍未寄到。个人修养固然不错，但接待人员很呆板，远不象我国外事接待工作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社会资源是那样丰富，科技是那么发达，整体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商品匮乏，品种单调，商品意识淡薄，商业意识缺乏（如周六周日除食品店外一般商店都打烊；很多地段该设店或设摊经营的都没有搞）。多种矛盾现象并存，令人费解。

商店里的营业员工作态度普遍比我们好，认真而耐心。大多将商品当场拆包检验、调试、让顾客过目，货真价实。贵重商品出售时，只见营业员在一些纸头上写了好几道程序才算完毕。但是，包装实在太蹩脚了，哪怕是精巧的工艺品，外面包的仍是一张粗糙的马粪纸。连象样的尼龙包扎绳也没有，只有纸筋线捆扎。因此，拿在手中，颇有点“金玉其中，败絮其外”了。我们不理解：这些用不着什么高深的技术与工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何解决不了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解决？

宠物方面，牵着狗的人有一些，但远不如西方国家。倒是鸽子的天堂。漫说克里姆林宫旁的红场周围，即使一般马路旁边，往往会有一些鸽子从你头顶越过，停在你的跟前，或地上觅食，或蹒跚而行，不怯生，旁若无人。也不见有人去逐赶它们，有的老妇还特地从提包里拿出事先备好的食物喂它们呢。人同鸽子是那样地和平共处的。

街头音乐家不少。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位斯文而漂亮的年青小伙子拉着手风琴引吭高歌，引来不少女士往地上帽子里丢下钱币。一对青年男女在彼得堡要塞门洞内一唱一拉，但未见有人给钱。在市中心最大的商店大门口，一个管弦小乐队在起劲地演奏，看的人多，给的人少。生意最好的是我们下榻的列城勃利巴金斯基大旅店门前的大广场上。我们刚到那天，在等待办理手续的一段时间里，我看到4位中青年组成的小乐队，演奏水平不低，技术娴熟，配合默契，曲目题材广泛，从小夜曲到进行曲，从民间歌曲到经典名曲。他们很会揣摩人们的心理，看见日本人来了，马上吹奏“北国之春”“樱花”，日本人就眉开颜笑地丢下钱来。看见美国人来了，又奏起美国歌曲。也有些外国人主动点曲子的。地上的钱已积得满

满的一个小盒子了，他们才收拾琴具，打道回府。我们在此住了三四天，这个小乐队天天来，生意照样不衰。

不知什么原因，中老年妇女工作的很多。我们住过苏联科学院宾馆的2处大楼，楼面服务员大多为老年妇女。国际列车每到一站，首先来的是手拿榔头的老女工，穿着护身工作服，用榔头敲打着道轨，检查着安全。我纳闷：为何不使用男工或年轻一些的？或许是人少劳动力紧张吧，我吃不准。

十一、告别莫斯科

7月1日，我们结束了访问，打点行装，启程回国。

飞机是在晚上8时许起飞的。起飞前，在候机大楼里足足折腾了一番。每人填写行李单，排长队等候检验、过磅，够烦的。好在本班机的乘客大多为中国人，未回祖国都有了回归感。也就是在排队候检的时间里，我们遇到了赵丽宏等3人组成的上海作家代表团，我们将同机返京，他乡遇故知，不亦乐乎！说来真巧，赵丽宏同志过去曾长期同我在崇明的一个公社里呆过，我在中学执教，他在乡下插队落户，但互相并不认识，后来他出了名，成了名作家，我们又先后离崇回到了上海，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见面呢！大家互递了名片，才把名字和活生生的人连了起来，真是无缘乡内不相见，有缘国外喜相逢。

为了对付机场检查，我们作了点小小的准备。因为事先已有所预料，说是送些礼物，行李将会安然无恙地通过，如惹气了服务员，对不起，够你瞧的了。因此我们特意保留着最后一把香木扇。根据2个星期来的体验，这把香木扇准能打倒任何服务员。对此，我们已有过2次切身经验：一次是在苏科学院宾

馆时，为了借茶壶，我送一盒清凉油给了服务员，她道谢后笑着问我是否有项链，我说“对不起，很抱歉，没有带”。我回到房间心里感到不踏实，于是急中生智，拿出一把香木扇（上海城隍庙买来，1元5角一把）送给了她。她惊讶之余，“啊哈”一声就过来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大概是外国人的礼貌答谢吧。还有一次，我们访问列城苏科院图书馆时，为了感谢接待我们的那位室主任，也送了一把香木扇给她，她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上次从中国回来时带来一些东西，就是忘了带扇子回来，我女儿很不高兴，一直嘟囔着说我怎么搞的，这下子可好了，她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了”。

快轮到我们的了，只见前面一个苏州市的访问团人员将一根珍珠项链（是否真假、品位高低不得而知）送给了服务员，——一位仪态雍容、满脸福相的中年妇女，只见她微笑地道了谢。我们的人上去了（只去一人，其他人推着行李车过磅）将一把扇子递给了她，她满脸笑容地说了声“斯巴西巴”（谢谢），然后客气地免去过磅，让我们的行李一大件、一大件在传送带上滑过去，她又笑着对我们说，这些行李都很沉，超重很多啦……我们自然连声向她道谢。当我们坐在楼上候机室里等候上机时，心想：如果每个团或每个乘客都送一件小礼物的话，那么一天下来可不得了，写字台抽屉里恐怕放不下了。在当前苏联国内商品严重匮乏、生活拮据的状况下，她（他）们却是例外的富有者了。

晚上乘飞机，我这是头一回，心里不太踏实，这黑咕隆冬的夜空能看得清吗？其实，这是外行人的杞忧。飞机一升空，机头灯光一亮，比白天的飞行更安全、爽快。上了机舱，一看

后排正坐着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教授等人。随着机舱前面电视屏幕上的闪闪忽忽，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飞机经过8个小时的夜空飞行，终于于莫斯科时间2日清晨4时许、北京时间10点多准点停在了机坪上。当我们步出机场，中国社科院外事局的小杨同志（也是上海人）已候在那里了，我们随车到了社科院的招待所，等候次日乘机回沪了。至此，我们的苏联之行也就“高高兴兴地去，平平安安而回”，顺利结束了。

后 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我们结束访苏返沪后，仅仅一个半月，即发生了“8.19”事件，而后短短数月之间，苏联局势急转直下。现在，作为15个加盟共和国的统一国家——苏联已于1991年12月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的发表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辞职而不复存在了，替代它的是11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为首的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联既已成为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统一的苏联虽不存在，但我国人民和原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仍将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苏联虽不复存在，但社会主义的业绩将永不磨灭，逆社会主义之动的后果将会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有益的教材。因此，复映一下这些已成为明日黄花的访苏杂记，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作者介绍：尤俊意，男、本县坎门人，法学家，现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人才培训中心主任、社科进修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政治学院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经济文化研究会理事。被编入《中国法学名人辞典》。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审：陈贻炘

总 编 辑：胡万梁

副总编辑：戴汉节

王志统

责任编辑：余必煜

朱仁巴

封面题字：叶尚青

封面设计：毛德宝